四十自述 胡適著

從文自傳 沈從文著

在出版界二十年 張靜廬著

我在六十歲以前 馬叙倫著

我的半生 陳鶴琴著

民國叢書

第二編

·86·

歷史・地理類

上海書店

張靜廬著

在出版界二十年

——張靜廬自傳

祇有自己才眞會了解自己
祇有自己才是自己的知己

在出版界二十年

目次

一 寫自傳的動機

一九三五年的秋天裏，「我的朋友」阿英先生受良友圖書公司的委託，編纂中國新文學大系中的史料部分，同時也替上海雜誌公司編校「中國文學珍本叢書」。有一天，偶然在我的家裏和幾位編譯所的朋友談起新文化運動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他向我說：「要編纂一部比較詳盡的中國新文化運動史，似乎不應該忘掉你」。這原是一句客氣的話，我當時聽了很覺得慚愧。分析他說這句話的語意，明明在說我

是一個推進新文化運動的實行者——出版商人，並不是說我是個在新文化啓蒙運動中間有過什麽貢獻的作家。但是，這雖然是句好聽的恭維話，却也多少帶有幾分的眞實性。我自信，在民國八年「五四」運動以後以至於現在，對於上海出版界的向着新的一方面的推進，多少是盡過一些勞力，耗過一些腦汁，這是不可磨滅的，也許爲同業的先進們所不否認的事實。因此，當時阿英先生和幾位朋友都叫我寫一本自傳，來記述二十年來上海新書事業的沿革和變遷，給後來留心新文化運動的史家們一些「或許有用」的史料。祇可惜我沒有文學的修養，缺乏寫作的技巧，絕對不會寫成一部值得一讀的傳記文學。所以在當時雖有想寫的動機，而終於不敢下筆，沒有勇氣來大胆地嘗試一下。

到了前年冬天，張天疇先生來替黃苹蓀先生所編的「越風」向我要稿，他指定要我來一篇關於上海新出版業的史實。他說：「你不妨以你自己的事業變遷爲經，多量地採入當時作家們與書店之聚散離合爲緯，織成一幅看去似乎平淡而實際却富有

圖案意味的美麗而實用的廠緲。」（他是杭州人，所以三句不離本行。）這句話更比較有意思了。因爲個人事業的成敗變動，寫出來實在是「與堂無涉」；何況像我這樣平凡的人，在現代化的大都市裏，幹這樣小小的出版商，有什麼長處可述給後之來者歌頌讚歎呢？假使要寫一部有關於中國出版事業的沿革和變遷的話，最好應該讓張菊生、陸費伯鴻、王雲五幾位先生來寫，才有相當的理由，我想。

不過，照張先生的說法，那麼，我既然在這號稱文化街的四馬路上住上了二十年，這悠長的歲月中，所見到的，所聽到的，和我個人自己親身所接觸到的，總該有不少的故事可以搬出來，給在文化街上跑跑而留心出版事業的讀者們，作爲茶餘酒後的談助吧。因此，我從去年冬天起，就有了想寫一本自傳的準備。可是因爲身體的不健康，和生活與趣的轉變——近一年來對於學習國畫的興趣特別濃厚，差不多每天晚上肯化上二三個鐘點，從事於一花一鳥的傳摹，同時還買了不少關於國畫理論的書籍和珂瓙版影印的畫册，抛了畫筆就拿起畫册，不斷的練習和鑑賞——覺

分不出一部分時間，來寫這「不必有」的自傳。

直到後來，上海雜誌公司進備出版一種「讀書」月刊，於是編譯所的同人，和金則人、平心等幾位先生舊事重提，要我用故事的體裁寫出來。這又是一樁難事了。因為我除在「禮拜六」派盛行的時代，曾經用過受林琴南先生影響極深的文言文寫過幾篇哥哥妹妹式的小說或談怪誌異的幾段筆記以外，十餘年來沒有再寫過一篇像樣的小說或小品文。在當商報編輯時，所寫的都是屬於記事速寫一類的新聞稿；在當書店經理任內，那更談不到寫文章了，最多不過偶爾高興做幾段宣傳性質的廣告底稿罷了。

現在這醜媳婦終究見了公婆面了，「像樣」、「不像樣」的問題，已經談不到了。不過我要請讀者們原諒的是，請勿要用文學欣賞的眼光，來讀這部傳記，否則它會使你大大失望的，這樣幼稚的作品。因為這衹是一個出版商人的自述呀！

二　我的生長地

我的祖籍據說是在河南，不知從那一代，隨宋室南渡，寄居在離浙江鎮海縣城二十里的前緒鄉淸水湖村。那村莊有三百多家戶口，都是姓張的。直到我父親三十歲時，才離開了，另搬到後緒鄉龍山城的西門外來住。這地方現在總名之爲龍山，是鎮海縣治的東北角，三北（鎮北慈北姚北的渾稱）特區的起點。

我在前淸光緒戊戌年（一八九八）四月初七日生於龍山。那時大概是在我父親

移家到這裏二十年之後。

龍山的地勢在國防上很重要，而風景也相當的佳麗。東南西三面都是山，是四明山的支脈：東面是石塘山，南面是達蓬山，西面是伏龍山，這三座山環抱着成弧形，一個峯依着一個峯的肩懷，像一隊士兵，肩並着肩，排成一條弧形陣列，雄偉而嚴肅地做了龍山鎮的天然屏障。北面靠着海，有兩條堅實的泥塘，擋住由太平洋襲來的狂浪驚濤。鳥瞰龍山全區的形勢，完全像一張弓，——「三面環山，一面臨海。」—（這是我幼年時作文的套語）

在達蓬山麓，有一個湖，叫做鳳湖。有了龍山，當然少不了要有一口配偶這象徵女性的鳳湖了。龍山和鳳湖，這是天然的一對佳偶。在大自然的孕育裏於是乎產生了一位近代偉大的企業家阿德哥。（註二）「人傑地靈」，有了像阿德哥般的大人物出現，然後這小小的龍山鎮，就具備了現代化的都市雛形：有交通部直轄的電報局，有電燈廠，有電話，有自來水，有小菜場，有救火會所，有自行起迄的火車，

有馬路，同時也有兩輛破舊的人力車。在公路還沒有通車之前，更有一條突出海面七里長的石海塘，那是給三北輪埠公司停泊鎮北輪的碼頭。掌握着三北人唯一的交通總樞紐。

這一條馬路和石塘，是龍山唯一的偉大的建築物，也是阿德哥一生最浪費的巨大工程。那條馬路沒有特標的路名，起點在虞家的門前，循着河直伸長到海邊，化上三四年的工程，轟炸伏龍山脚的岩石，利用輕便的運貨車，一車一車的無窮盡地向東海裏傾倒，待到石塊填滿了海底之後，上面就用水泥塗上石縫，舖些黃砂，才算告成了一段路。幾十個工人，從日出到日落，沒有一刻休息的時間，永遠地永遠地向着大海進攻。但是不幸得很，這裏的海灣，是正衝着錢塘江口的流沙。你築起一丈海塘，過了幾天那流沙也同樣的壅塞一丈；你築起十丈，流沙也同樣的壅塞十丈。輪船是永遠不會吻着你的海塘的。待阿德哥覺悟到這「人定不能勝天」的時候，那海塘已經築成了有七里多長，糜費的金錢也已經達到八十多萬元了。

馬路和石塘銜接的中間，建造着一座新型的車站，火車的軌道從這車站起一直到石塘的盡頭。有十輛列車，也有頭等的三等的，和載貨的篷車。車廂大小等於上海的電車。當鎮北輪滿載着「三北同鄉」從寧波到碼頭的相近處，另有一隻鎮龍駁船往返起駁，絡續地坐在這車廂裏等候完畢；「嗚」的一聲，火車頭就有氣沒氣地緩緩循着石塘、拖到車站裏，在紅綠旗的交揚處停住。旅客們下了車，也一樣的領行李，驗車票，再沿着這馬路，喜氣洋洋地踏上了他們故鄉的土地。

在國民政府還沒有成立以前的時代，一個鄉村的建設具備着都市化的雛形，浙江省境內確實找不出第二個，我們名之爲「浙江第一村」，並沒有覺得誇大。（現在有了更完美的溪口了）

爲着想觀光這「浙江第一村」，光華書局的老闆沈松泉，盧芳二位朋友，由我陪伴着去遊歷過一回。這時候正在夏天裏，龍山特有的火車頭，因爲夏天的旅客減少，循例載到上海去修理去了。那天，照例上碼頭，也照例登了車廂，祇是沒有聽

到汽笛的叫聲，全行列車就開始前進了，但是走動得似乎特別慢。爲了好奇心的驅使，他們伸首向火車前後瞻仰一下，眞使他倆歎爲奇觀，原來全部火車是由四個脚夫在後面推動的。(註二)

「這眞是天下第一村呀！」沈老闆笑着說：「龍山村居然還有人力火車哩。」然而龍山的風景畢竟是美麗的，當他倆坐着轎子，沿着馬路上來的時候，一陣雷雨洗淨了達蓬山的頭面。一堆紅一堆綠的格外地鮮豔像小品文封面上的圖案。一條長長的虹，彎彎地越過伏龍山頂，落在石塘山邊的海面上。馬路兩旁的洋槐，伸出新生的嫩枝，交互地握着手，像一條油碧的長廊。枝葉輕輕地掠過轎子的前簷，沙沙響着，葉子上新沾的雨點，洒到從上海來觀光的新人的臉上。涼風拂動擱在轎沿外的二條脚管，直鑽進旅人的胸懷，汗，是不知在什麽時候消失了。綠染遍了田野，蔚藍色的天空裏沒有一片雲影，一隻二隻燕子，低低的掠過轎子前張着白色布簾，發聲三北特有的民歌從隔河茅亭裏傳來，與水車的轆轤聲相應和。

這眞是人間的仙境，世外的桃源呀！

這裏，從我見識世面起，沒有遇到水災，也沒有遇到旱災；沒有經過戰事，也沒有盜患和匪禍。這樣的太平樂土，眞是中華民國僅有的一塊乾淨土。

龍山，因爲牠是在南宋以後才有的遺民居留地。「在海靠海」，所以從前的居民多數是以捕魚爲業的。海，是沒有明顯的分界的。爲爭奪「我們的海」的權利，土著們就勇於械鬥。聽到鑼聲一響，男子漢都從田裏海裏歸來，娘兒們很快的擦亮了長矛上的尖鏃。等候她的勇敢的丈夫，爲宗族的利益而奮鬥。每一次械鬥，要待打得死了人才肯歇手。「死了一個人等於一隻老鴨錢」，(註三)由宗祠裏賠償六毛錢就算完事，很少告官控訴的。這風氣到民國後才消滅了。(械鬥的事在三北是常有的，但是我小的時候祇看到過一回「揚鞘」。(註四))

龍山的風景雖相當佳麗，而古蹟却不很多。這鄙塞的海濱，當然難得有騷人墨客的光顧，或達官顯宦的降臨。值得紀念的，祇有一方矮小的龍山城，那是明季湯

和戚繼光兩將軍防禦倭寇時，所建築的沿海十八衞之一。伏龍山和石塘山山巔上還遺留着當時報告倭寇來犯時用以擧火告警的烽火台的遺址。

城完全是泥土建造的，周圍祇有四方里，三面都有門，獨北城沒有。因爲那時候北城正靠着海邊，潮汐高漲時會衝到城牆的脚邊。城裏居民並不多，繁盛的商業區，都在西門外面，有一條長長的街道通到城裏，也通到龍山的碼頭。最大的教育機關有二個小學，一個是阿德哥私立的龍山學校，一個是鄭望枚先生手創的演進學校。演進學校坐落在西門外村的中心區，靠學校的南邊有三間古舊的樓房，那就是我的生長的家。

伏龍山在宋朝時候，還是海邊的一座孤島。因爲整日夜受海風的襲擊，山上的樹木就不容易長大。山的背面，有一座尉遲恭手建的伏龍禪寺，當宋朝唯一的政治家王安石先生任鄞縣令時，和寺裏的方丈很知己，每隔一兩個月，王先生總要雇着一隻帆船從鄞縣駛到山邊，上來拜候他。往往要盤桓幾天才囘去。每一囘下山，這

位方丈總送他過自滿倉（就是現在豎着小小浮屠的海涯靈峯），到前峯的石屋（臨海的燈塔）旁邊站住，遠遠地望着他一步步的踏着下山的石級，登上繫在山脚下的木船，解纜升帆，緩緩沿向海邊移動，從大到小，直到瞧不見了才囘寺裏。這是刻版般的送客程序。這樣經過了好幾年，王安石奉詔到京都去的那一天，他親筆寫下了一首詩，刻在石碑上，叫他的朋友——方丈，待刻好，就豎在自滿倉和石屋中間一條山澗的旁邊，留作紀念。那位方丈也在石碑的另一面題了「刺史橋」三字，作爲紀念。從此這山澗上面有了一條半月形的石橋，也就是紀念王安石先生的刺史橋（俗名仙人橋）。可惜，這歷史的故事並不爲鄉人們所注意，所以這塊石碑已經給後來主持的僧人磨平，改刻修理仙人橋善男信女的台銜了。二十年秋，弘一法師從雁蕩仰天窩下來，在寺裏挂錫了好幾年，於是這叢林又稍少爲佛門信徒們所注意。

伏龍禪寺確是很適宜的一所肺病療養院，爲要繁榮龍山鎮，阿德哥曾經想開闢爲風景區，同時想在白雲嶺上另建一所現代科學化的療養院。有一次請過浙江巡按

使屈文六先生到龍山去參觀；更有一次，他請了駐滬各國領事們去遊玩，想將伏龍山開闢爲避暑地帶，假使洋大人們都認爲還有意思的話。然而，這兩個計劃都沒有成功，徒然累得兩校五百多個小學生站在碼頭上大半天，每個學生祇吃得著一隻小麵包。

現在鄞杭公路完成，三北的交通已舍海而就陸了。這偉大的建築物，僅僅做了冬季棉花運輸的出口處，阿德哥曾經爲牠化上八十多萬元有用的金錢這回事，已經在我們龍山的小百姓們的記憶中漸漸地消失了。因爲這是無裨於民生，也算不上有地方公益性的事業，祇是爲便利他個人或公司業務上有相當利益的建築物罷了。

(註一)滬甬一帶對於虞和德洽卿先生的流行稱呼。

(註二)這火車是宣統時南京南洋勸業會會場用過的。

(註三)這是一句流行於三北民間的口頭語。

(註四)是二姓宗祠裏所有的太刀長鎗都拿出來陳列着，但是沒有動手打。

三　屠戶世家

老實說，我對於我的家世太模糊了！

四十多年來，沒有見過我的祖父祖母的面；也沒有機會認識我的大伯伯和三叔叔。說來未免有點滑稽吧，連祖宗，三代，近支伯叔的名字，到今天還不曾弄個淸白。這原因，一來是當我出世的時候，父親已經五十多歲了，祖父母早經去世，伯伯和叔叔那時候是否還健在；或雖健在着，但是否因爲和父親不睦，老是不相往還

的，我不淸楚。二來是因爲我父親生性倔强，壯年時就和族裏的人不相投，獨自個兒帶了我母親和剛生下不久的大姊姊，搬到別的鄉鎭來做小買賣。此後，族裏的事情就不相過問，所以沒有遺留下一本宗譜，可以給我們查考查考近房遠支的系統。而且終我父親的一生，從沒有向我們談起過家庭裏或宗族裏的事情，似乎有什麼說不出的隱痛。他不向我們說起，我們自然也不便問他。這隱痛，潛藏在老人家的心頭七十一年了，終于隨着他的軀殼，一起埋葬在南山麓的一堆黃土裏。

好在我現在不是想寫「家乘」，也不用推算我們的最初始祖是漢朝的留侯呢，還是三國志裏的張飛第幾代孫。更就我出身的貧賤而論，也就一想而知，近代的祖先，都不曾做過什麼大官高爵，中過擧人進士。否則，總該多少有些民脂民膏，可以留給我們當子孫的享用享用罷！那麼，卽使查考得出來，也不會增高我的身份，給人們推崇一聲「世家子弟」。

現在祇就我所曉得的記述出來，當然要從我的父親開始。

我父親生長在一個貧苦的佃農家裏，所以他沒有好好地唸過書。在我們鄉下，有一種「唸雨書」的，晴天裏下田做工，逢下雨的時候，才領到私塾裏去認字。這是貧苦子弟們唯一的讀書機會。因爲終究雨雪的日子比陰晴的日子少，所以「束修」就可以特別減低。這在私塾教育時代是很普遍的。現在有了學校，這辦法自然不再通行的了。學校的學費，是有規定的，上課下課的時間也一樣有所規定，你如果沒有相當的學費，或者沒有上課的工夫，那麼書本子是永遠不會跳上你手心的，「書」原是留給有錢的哥兒們讀着玩的。

鄉下貧苦人家的子弟，認識字的終究不多，我父親已經是個例外。他既會認識幾個大字，於是乎就有了野心，有了向外發展的野心。祖父一過世，就立刻放棄了父傳的(或許是世傳的)佃農生活，到龍山鎮改做小買賣——鮮肉舖。

做鮮肉舖買賣的商人，在前淸時代，是最被縉紳大人們所瞧不起的下等人——屠戶。當我父親從淸水湖搬到人地生疏的龍山來住，這三四十年裏，受盡了當地土

豪劣紳貪官汚吏們的折磨，侮辱，壓迫。他不能反抗，也不敢反抗，於是漸漸地養成一副暴燥的性情，和古怪的脾氣。從我曉得，沒有見過他一回歡樂的笑容。長圓的臉，鑿着無數深刻的縐紋在他的額上。沉默而寡言笑。喜歡吸旱烟，手裏老拿着一桿長長的旱烟管，裝着一隻堅實的銅斗。當他心裏有事的時候，祇要遠遠地聽到他用力在石板上敲着烟斗的聲浪，一家人就會肅靜迴避，鴉雀無聲。這是他特有的標幟，也是他唯一的伴侶。

我不明瞭，是不是他因爲過度的受着土豪劣紳們的壓迫，心理上起了反應。他最厭惡的是穿着長衫大掛的人們，無論你是讀書的，有身份，或是在上海發了洋財的買辦們。他沒有交際，也不會應酬。一生沒有一個知己的朋友，全副的精力，都放在他白手起家的一爿鮮肉舖上。勤儉，在他是成爲習慣的了，掙下來的錢，從不曾爲求個人的享樂，而浪費過一文。七十歲的老翁，往返二三十里外辦貨，老是委屈着兩條腿的。

他習慣于走夜路，太陽不下山，老是不想起步的。偶然逢着沒有月亮的黑夜裏，獨自走着二三十里路囘來，中途在涼亭裏息力，當他特有的銅烟斗敲響涼亭旁的石柱，那睡在亭子裏的老丐，被驚醒了：

「是立芳伯麼？」

「唔！」

於是這老丐就擦着惺忪的睡眼，摸起來，燃着一把手提的紙燈籠，很高興的陪伴他囘到家裏。無論那一處的乞丐都認識他，無論什麼時候，風霜雨雪，都願意陪着他。這樣，也可以說，他一生的朋友，唯有窮得一無所有，壓根兒不會穿長衫大掛的叫化子們。正因他的朋友大都是叫化子們，所以他才肯將一生勤儉所得的金錢給施給他的朋友們身上，成爲縉紳大人們所瞧不起的「鄉里的善人」。

這是「消極的報復」麼？還是生長有一顆仁慈的心？

他是一個「無神論」者，不相信鬼神，也不拜佛唸經，一生沒有吃過一次齋；

這和我母親恰恰相反。

我母親姓王，也是一位佃農家裏的窮女兒。她在十八歲那年，嫁給我父親，父親已經二十六歲了。她頂信佛，什麽地方寺庵裏做着佛事，都有她的份兒。她認爲屠殺牲口是頂罪過的營生，所以她虔誠地爲我父親，爲她自己，爲我們一家人懺悔祝福。她盼望我們子女們長大起來，都另外找尋職業，結束這卑賤而又罪過的屠戶生涯，脫卸了短衣，換上長衫。這樣的思想不同的老侶伴，眞所謂「同床異夢」的了。

我有四位姊姊，二位哥哥，在兄弟姐妹行中我是最小的一個——老七；也是頂小的男孩子——老三。大哥患着肺病，死時才三十一歲，遺留下兩個孩子——鴻品、鴻飛。二哥是父親頂鍾愛的一個，他不僅承繼了父親的事業，且襲蔭了父親所遺留下來唯一頭銜——「鄉里的善人」。

四 唯一的母校

因爲父親不願子女們穿長衫大褂，所以我的兩位哥哥，都沒有讀幾年書，就拋了書包，學習商業。我雖是兄弟姊妹行中頂小的一個，揆之「爹娘喜歡小妮子」的常情，在那時候的家庭環境，培養一個兒子入高中進大學，經濟能力還是可能應付的。至於鍍銀鍍金，當然我連做夢也不會去想他，何況我們鄉下就是富家子弟也不曾有過這渺茫的「投資」。但是，不幸得很，父親固執的信念，無法動搖，於是乎這

鄰居的演進小學，就成了我唯一的母校了。

演進學校的創辦人是鄭望枚先生，這是三北，也可以說是鎭海全縣唯一的維新人物。他於光緖三十一年在鄕間改革私塾，創設通德學校；後來又改爲啓蒙學校，到三十五年才另建校舍，正式成立演進小學。

我在八歲那年開始進李鳳聰先生所辦的私塾裏唸書，讀的書當然是百家姓和大學中庸。讀了三個月，因聽從書塾裏老學生子的唆使，偷取母親枕邊藏着的二毛錢，買水菓去孝敬他，被母親發覺，狠狠地打了一頓。——這是我受到我的母親第一回也是最後一回的敎訓。打過之後，我父親就不叫我再進這私塾去讀書了。休息一年，到第二年(九歲)的春初，演進學校開學了，繼續以新生資格進校，開始讀「天地日月山水土木」。那時候小學制度，不分高初級，小學統稱爲國民學校，五年制，讀完了五年畢業，就升中學，中學四年畢業，升入大學預科；大學五年，二年是預科，三年是本科。

我在私塾裏已經讀過半本大學，半本中庸，雖然大學中庸裏的文義，先生沒有講解，學生也不會領悟，可是這白紙上面印着的黑字，確實已認識了不少了。現在拿到國文讀本第一冊，這書裏的生字，十頁中倒有八頁是會過面的，所以讀起來，就一點不費力。當時敎國文的是鄭品蘭先生，他認爲我天資聰明可以升級，一升就將我升到三年級裏。學校的課程，到底同私塾有些異樣，私塾裏的功課簡單，除掉背書默書對課寫字之外，別無所事。學校裏則有地理、歷史、格致、算學、體操、唱歌等等，（那時小學三年級起就敎本國史本國地理）我對於國文課，雖然還有幾分把握，但是對於其他各課，都還是茫無頭緖。而尤其對於唱歌算術，認爲頂怕頂不喜歡的功課。因此，每逢考試，國文是穩拿第一名的，其餘的大多是吃「紅蘿蔔」。

這樣的讀完了五年級，總算畢業了。第六年因爲沒有福氣進中學，仍在學校裏補習一年。這一年春頭，學校裏另外聘請來一位新校長童友香先生。他年齡很輕，剛從寗波師範學校畢業，到這裏充任校長。他有樣不很好的脾氣，就是喜歡打學生

他教的是英文課和數學課。英文課是華英初階，數學是小數。我平時對於數學是老不及格的，而對於英文一門，也不大上進；說得響亮些，是不大喜歡這撈什子。所以他辛辛苦苦地教了三個多月，我連廿六個字母還沒有弄清楚。順序唸下去，像老婆婆唸多心經一般，非常流暢，若是中間挖出一個字母來叫我讀，那是祇有他認識我，我却不理會他。這樣的笨學生，當然引起童校長的不滿，何況他原是喜歡打人的，於是我的兩隻手心，就給他打得紅腫，像捧着兩隻剛出籠的饅頭

從這一打之後，我就和我唯一的母校，永遠脫離了關係。

就在那年秋天，演進學校的創辦人鄭望枚先生，爲辦理地方自治，徵收附加捐稅，做了三北農民抗捐暴動的犧牲者。學校裏的書桌坐椅，也同時在暴動時搗毀殆盡，事實上秋季不能繼續開學了。這半年，我就轉到鄭九齡先生的私塾裏去讀書，讀的是幼學瓊林。以一個小學畢業的高材生，來讀幼學瓊林自然是毫不費力，所以很得他老先生的獎許，有時居然也代替先生坐坐冷板凳，充猢猻王，自得其樂的度

過了一學期。

書是不能讀下去了。

第二年春天起，我踏進了社會，踏進了人吃人的社會。離開愉快歡樂的母親的懷抱，開始度我三十年來的流浪生活。

五　不長進的孩子

書既然沒有機會唸下去，當然應該「學生意」了。做買賣的頭一度關就是當學徒。舊商店的習慣，期限是十足的三整年纔算「滿師」。雖說長長的三整年，然照「十年抛磚錄」(註五)所述的理由，却並不算久；因爲舊式的商業，注重在經驗，一個「行業」有一個「行業」的祕訣，這吃飯的本事，是需要你暗裏摸索，慢慢地自己領悟的。於是較大的或較複雜的「行業」就是再化上三個年，也不會使你全懂得。

但是，事實往往不是如此，儘多有當了三年學徒，完全在替業師倒夜壺，替師母抱小囡的傭僕生涯裏度過。

民國元年，照舊曆的習慣計算我已十五歲了，論理該在十八歲那年，可以「滿師」。可是我雖然也一般當學徒，並且當了兩度的學徒，却始終沒有滿過一回師。這在舊商業習慣上，是很不名譽的事。凡是沒有度滿三年時間而中途退出的，叫做「回湯豆腐乾」，不拘你是什麽原因，在老人們的心眼裏「回湯」的總是不長進的孩子，很少有人家的女兒肯嫁給你；除非你家裏有的是錢。

我第一回「學生意」是在上海天潼路的同慶永燒酒行。這酒行的老闆是我們鄉間的暴發戶，人是白胖胖的，體重足足有二百五十多磅，嘴裏老含着一根雪茄，活像個坐在寺庵山門裏的彌勒佛。他家裏原是很窮的，母親還是個窮得沒飯吃的再醮婦。自從他吃了這一行飯，就發起大財。新屋也蓋起來了，田地也買進了，豐衣足食，「衣錦榮歸」，怎麽不使人瞧了眼紅！所以我母親就千恩萬謝的託他帶我出來，

也叫我吃這行飯，或許也會發一筆小財，說不定。

在陰曆三月初七那天，我開始度我燒酒行學徒的生活了。酒行的重要技術叫做「品夾」，將上好的原粱酒——也有用火酒充數的——羼入攙成自來水，加上黃梔水，再加上一些久經浸在酒裏的藥材汁，那就成了木瓜酒，或者五加皮。火酒羼水當作高粱，吃了對於健康上是有很大的損害的，然而爲了想賺錢，似乎都不會顧到牠。如果不這樣做，我們的老闆就永遠不會白胖起來了。

這是高級店員的工作，當學徒是毋須做的。學徒們最吃重的工作是洗瓶，每天視營業的需要，要洗完一百隻或二三百隻，不管你是冬天還是夏天。洗瓶用的是冷水，嚴寒的冬天，兩隻手放在冰冷的水裏，實在有點吃不消，然而這是學徒們應做的工作，誰肯來體恤你呢？於是你的兩隻手十隻指兒不待到冬天，已經像四川大旱災裏的田版了。說得通俗些，活像上海人挺愛吃的「糖粆嫩栗子」。此外，頂普通的工作，是倒夜壺、擦水烟袋、盛飯、掃地抹桌、凡是一個賤役所應做的事，你全得做。

這樣，整整地度過了一年又三個月。二次革命發動，陳英士先生率領了一班革命軍攻打滬南製造局，風聲一天天緊起來，謠言也一天天大起來。我母親在鄉下很不安心，怕他的小妮子會被大砲吞吃掉，急得派個親戚趕到上海來要陪我回鄉去。當我親戚踏進酒行裏來說明他的來意時：

「這是不行的！」我們老闆扳下臉皮說：「假使每個學徒都像他一樣，那不是我的行要關起門來了麼？」

這句話確實有幾分眞理，祗是我那位年靑的親戚入世不深，他居然會答出這樣的一句話：

「這我可管不了！我的事祗是陪着他回家去。」

「什麽話！」老闆跳起來，氣憤地臉上的顏色已經從白裏變紅紅裏變靑，「要回去，就永遠不許再進來！」

「好……」

我就像一隻羔羊般，在那位親戚的翼護之下，做了第一度的「囘湯豆腐乾」。

雖然在上海祇是短短的一年又三個月，我得感謝這給我當學徒的酒行。在這一年裏，我爲求調劑苦悶而辛勞的生活，唯一的安慰是看「小書」。那是有一個背了包的書販子走上店裏來，他專做租借的買賣，每一套書祇要化三四個銅子，就可讓你看個飽。短小的三天一掉，大部的就擱上一個半月都要得。「小書」就等於現在的一折八扣的標點書，什麼都有；當然，小說筆記是比較多些。

從這批「小書」我被引進另一個天地裏了。

當學徒的時間是不值錢的，遲睡早起，足足要工作十四小時，白天裏沒有多大空閒的時間，給你舒舒服服的看書；可是等到午夜人靜之後，用舊報紙套在電燈罩上，就很自由的讓你一長二短地看下去，到你的兩隻眼睛睜不開的時候停止。這一年，我整整地看完了所有的演義彈詞，和閱微草堂等一類筆記書。

一直到了十六歲（民國二年）那年春季，我才始掉換口味。第一本給我發現的

新大陸，是惲鐵樵先生主編的小說月報，那是一本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刊物，內容注重文言的小說和近代掌故的筆記。在這刊物裏，我在自學文言文，於是林琴南先生成爲我唯一崇拜的偶像了。一本冷紅生的茶花女遺事就不曉得掉了我多少眼淚呢！憑良心說一句公道話，我不反對林先生（從他的古文筆法上），他的翻譯小說，與給我比在學校裏穩拿第一名的國文，還要有興趣，還要進步快。林譯的小說雖是各門都有，在那時最配合我脾胃的要算言情或哀情小說了。這是青春期青年們必然的經歷，我當然不能例外。何況那時候根本就沒有講革命談主義的書籍刊物，有的，祇是風靡一時的「禮拜六派」的小說雜誌。就是提倡革命的報紙，報屁股上刊登的也是這一類的作品。徐枕亞的「玉梨魂」便是當時在民權報上挺受人歡迎的一種。

老實說，當時我唯一的希望，是想在商務印書館裏當一名練習生。我有愛書的嗜好，我有看小說的興趣，我有想做出版家（甚至於做作家）的慾望。因此，每天晚上當酒行裏打烊之後，總得從天潼路走到棋盤街（那時大小書店都集中在河南路

上），在每一家書店的玻璃櫃窗外，獨自個兒站立片刻，老是瞧着這五光十色的小說封面發怔。

「棋盤街巡閱使」──這是同事們用以嘲笑我的代名詞。

（註五）是一位南貨店經理某君的自述。

六　禮拜六派時代的輪廓

民國二年八月的某一個早晨，我在睡夢中給我母親喚醒，說「你今天又要動身了」。我明白，從今天起，我又將繼續度我一年又九個月的未曾「滿師」的學徒生涯了。

「行業」是另外一門，——是一家洋紙號，是設在上海新開河一個街堂裏的新康洋紙號。那家舖子是新開的，由我的二哥姊夫和一位世交的朋友合股的。我在這

裏「過堂」(註六)，但是也得拜業師，倒夜壺，擦烟袋，盛飯等學徒們應做的工作，還是同樣的做。

論勞逸，洋紙號的學徒確實比較燒酒行安逸得多了。因爲是字號式，所以休息的時間也比較早，有很多時間，可以看書或寫字，祇要你自己肯用功。至於公事，普通的是打棧單，送紙張，拆箱或裝船。然而中國舊商店，總究一個「行業」有一個「行業」的祕訣，那祕訣，就是吃飯的本領，化上三個年頭的時間精力，所學得的就這些「不老實」的祕訣，說得透澈些，就是「作弊」的方法。據說每一家商店裏所掙的「盈利」多或少，就看你使用這祕訣的本領大或小——「作弊」的方法聰明還是笨拙。

洋紙號裏過去視爲祕訣的「作弊」方法，現在大多數都成爲公開的祕密了，例如「冲磅」，將實際的六十磅紙張喊做七十磅，一百零五磅的喊做一百二十磅；「剃頭」，將每一令紙(五百張)抽出五張或十張，在顧客買去十令二十令時，當然不會

不怕麻煩，將每一令紙都去數過的；「掉包」，將比較劣等的紙張，在包皮上面換貼一種顧客所指定要買的商標牌號，待你覺察到時，白紙上已經印下黑字，要掉換也沒有辦法了。一切的「作弊」方法，當我做學徒時代，的確還是偷偷摸摸的，在老闆或經理看來，認爲是不名譽的行爲，所以祇有不得已時，偶一爲之。現在呢，這一切都毋須再祕密了，不會做或不願做，那你就是白痴，不僅同行中人要笑你傻，就是聰明的顧客也會欺負你是「內行裏的外行」了。

× × × × ×

在民國二三年間，中國的文壇是「禮拜六派」最活躍時代，眞正老牌的禮拜六週刊就產生在這個期間。那時候文壇的領袖者有二個巨頭，一位是青浦王鈍根先生，一位是吳門包天笑（朗孫）先生，而包先生的勢力似乎不及王先生，因爲那時候的王先生擁有申報的自由談和游戲雜誌、禮拜六週刊三大地盤，我們不能否認周瘦鵑、陳蝶仙（天虛我生）的成名，是經他推薦出來的。

「禮拜六派」第一本和讀者見面的刊物是自由雜誌，那是王鈍根從過去在自由談上發表過的文章編集攏來的，用十六開本印成二期，每期售價四角，歸中華圖書館印行。在當時，也許是王先生拿來嘗試的，不料這二本新古董却會獲得廣大的讀者羣，於是乎引起了王先生再接再厲的勇氣，第二種嘗試品的游戲雜誌就用同樣的形式和內容出現了。

我們不要忽視這裏也曾出現過一位天才的作家——羅韋士。他是一位青年的海軍學生，他做過老農家乘，兩全難等十餘篇創作。這是「禮拜六派」的彗星。在那時，實在沒有比得上他寫得再好的作家了。但是這短命的小說家，僅僅發表了十餘篇的創作之後就死去了。羅韋士，這一個不很熟識的名字，已經在讀者羣甚至曾經當編輯的先生們的腦海裏消失了。

隨着游戲雜誌而風起的同樣刊物，（不僅內容同，就連形式和定價也完全相同的。）這是中國文壇和出版界挺會玩的拿手好戲。）有天虛我生主編的女子世界，許

嘯天主編的眉語，李定夷主編的小說新報，徐枕亞主編的的小說叢報。在這許多雜誌中雖然有低級趣味的，也有相當價值的。我們如果不是站在今日的立場來批評昨日，那麽，我敢說文明書局先後出版的姚鵷雛先生主編的春聲，和包天笑先生主編的小說大觀，確是這時代的一「鷄羣之鶴」。而尤其是春聲月刊，擁有南社許多詩人和文藝作家，足以傲視一切的。

自從禮拜六周刊風行一時之後，吳雙熱，以純趣味化的滑稽文字創刊五銅元周刊；胡寄塵(懷琛)以莊諧並重爲號召，出而創刊其所謂白相朋友。禮拜六在這時代眞是再紅也沒有的刊物，在六十期以前(六十期以後銷數慘跌，減售五分，勉强支持到一百期爲止)，確有幾期銷過一二萬本以上的。周瘦鵑先生是在這些刊物中最實力，也挺受少男少女們歡迎的一位作家。

在許多單行本小說裏，最風行的要推徐枕亞的玉梨魂了。這是偶然的發見——一位曾在民權報館當營業部職員的馬志千先生，沒有事了，就將民權報副刊上登過

的文章分類編成發集民權素。印出來後，銷路很不錯，因而他就將長篇連載的小說玉梨魂另印單行本發賣，不料出版不到一二個月，就二版三版都賣完了。為了版權問題和原作者發生了糾葛，兩方都登着廣告互相攻訐起來，於是，這一部駢四儷六的哀情小說，就隨着他們的互訌而大銷特銷了。我們如果替民國以來的小說書銷數做統計，誰都不會否認這部玉梨魂是近二十年來銷行最多的一部，徐先生靠也靠了這一部書（雖然也還繼續做過雪鴻淚史、刻骨相思記等）居然「人財兩得」了。

這是「禮拜六派」時代文壇的輪廓，也是民國二三年間出版界的一般狀況。

「你為什麼這樣清楚呢？」假使有人這樣問：我直截了當的可以答覆他：「那就是棋盤街巡閱使的記錄呀！」

（註六）沒有滿師的學徒換一家舖子繼續學下去。

七 閱讀與寫作

從民國的二年秋季到四年的初夏，——十六歲到十八歲的一年半裏，我完全成爲「小說迷」了，既然天天向着棋盤街上跑，自然不時也要買幾本心愛的小說或雜誌，很珍奇的捧囘來，密藏在寫字抬的抽屜裏，空閒的時候鄭鄭重重地拿出來看一篇兩篇，同事們要想借，當然「嚴詞拒絕」，卽使在書的封面上摩擦一下，也至少要撅起了兩爿嘴唇，同你三日不理，五日不睬。這樣不近人情，雖說是爲了愛書成癖；

但是「得之匪易」，也是一個重大的因素。

一本書的代價，雖祇二毛三毛，然在學徒時代，這幾毛錢的積儲，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時候，舊商店裏學徒們在學習的三年期內，根本無所謂報酬。每月底給你二三十枚銅子，叫做「月規」錢，說是給你理髮洗澡用的，剩下來還得買一塊肥皂，自己洗滌衣服。在一年底給你的叫做「鞋襪錢」，顧名思義，就可以明白一個學徒一年所得的不過是買鞋買襪的幾元必要的用費罷了，那裏還有買衣服買書報的意外餘錢呢？所以在學徒時代，衣服大多是由家裏做了寄出來的，至于讀書或買書的錢，那就看各人的家庭狀況，或者也有「業師」額外補助的，或者向同在一個地方做事的親戚同鄉們借來或要了來的。

把洋紙字號裏和燒酒行裏的學徒時代我個人生活比較一下，那眞有霄壤之別。因爲這舖子有我的哥哥和姊夫的合股，我雖然不好自以爲也是「老闆」，但是「準小開」的資格是綽綽有餘。因此，對於經濟方面，除掉應該領取三百文的月規錢之

外，遇着有「正當用途」時，當然有資格可以向會計部借支三元兩元。所謂「正當用途」在那時唯有買書，當書本子一本一本的高堆在寫字枱上面，再看看舖子裏的同事們，就以爲自己是了不起的人物了，而別人呢，都是些「不學無術」的市儈。

× × × × ×

我自己是一個讀者出身的出版家，我深切的感覺到沒有錢買書而要想「揩油」看書的困難。所以當我創設上海雜誌公司的時候，第一步辦到一切新書雜誌都攤放起來，絕對的並且很歡迎沒有錢買書的讀者自由自在地翻看他所需要的書籍和雜誌。現在這風氣算是打開了，老大的商務印書館也將所有的玻璃櫃都收拾起來，換上了長方形的一張張木櫃子。四年以前當我們裝修新書架的時候，很多同業朋友中總以爲我在節省裝修費，添置不起貴重玻璃窗；但到後來大家眼見着雜誌公司發行所站着看書的讀者擁擠情形，於是反想到這也許是「生意眼」吧，從前化上幾千元幾百元做成的寶貴玻璃櫃，也不得不請它到棧房裏去休息一下。

讀者大概還記得起吧，一本一本五光十色的新書，斜躺在玻璃櫥窗裏的時候，「巡閱使」們要向牠拿出來看一看，是多麼不容易的事呀！當你一隻脚跨進書店的門檻時，全舖子裏夥計們幾十雙烏溜溜的眼睛不約而同的一齊射到你的身上來，使你沒有勇氣再搬動你的後面一條腿；就使放着大大方方的模樣走進店去，站在某櫥窗的前面，當你的一隻手還沒有舉起來，（或許是舉起來抓着頭皮上發癢的），就有一位伶俐的小學徒很快的跑來，站在你的身邊，牢牢地叮着，叮着，叮到你走出他店門爲止。在這樣嚴重的監視之下，像我們當「巡閱使」的眞是「無所施其技」。於是祇有無目的地瞧那一家舖子裏生意好，買的人少或買的人多的處所裏亂鑽，那時候店員們當然不會再顧到你，就是他們要顧到你，或在比較遠些地方睜大了眼珠眼叮着你，那你也只好老着面皮「置之不理」了。

我整整做了三年「巡閱使」，於是我的處女作「冷與熱」，在緊張的情緒中鄭重地托郵局送到禮拜六周刊編輯部去。這個孩子生下地我足足有三整夜沒有好好的睡過

覺。這一篇小說的故事是寫述一個女人周旋於貧與富的二個不同環境的青年中間，那個女人的愛情時馳時張，完全以金錢的有無爲轉移，冷與熱給人捉摸不定。這篇作品的完成，也許曾化上好幾個月的精力，自以爲是再好也沒有的了，編輯先生賞賞的信，就寄到達自己的手裏。但是，意外地，過了一星期，這篇小說稿突然原璧奉還，附着鈍根先生的回信，說這篇小說故事結構和寫作都還相當可以，可惜裏面有很多費解的句子和別字。的確是事實，一位小學畢業的學生，想寫成一篇完全用古文筆調的小說，要明暢通順，確乎是件不容易的事。稿子雖是退回來了，但是我的寫作嘗試的勇氣，並不因爲碰壁而降低；反之，我却意外地興奮，更大胆地想創作幾篇同別人不同形式與內容的作品。

過了一個月，我第二篇小說「游絲」完成了，寄到一張男人主編的婦女週報裏去。到下一期週報出版，這篇小說居然承蒙採登了，編輯先生還在後面加上一段按語。

這可以說是一件最快樂的事情，當時心臟的跳躍會格外急促，全身的血管都澎

張起來像中了瘋一樣，坐着站着都感覺不舒服。這一天，跑到棋盤街和四馬路去巡閱時，兩條腿也特別輕鬆了許多。當天在每一個報攤裏都買它一張週報，挾了一大捲足足有幾十份回來。在電燈的光罩下循迴地讀上牠十遍二十遍。

這晚上，輾轉反側，再也不會睡着了。一個小小的心窩，老是卜通卜通地跳動着。

第二天早晨，我去拜謁這位婦女週報的主編和發行人沈卓吾先生。——從此以後，我們就做了忘年的朋友，這是我在上海結識的第一個朋友。（沈先生後來成了上海的名記者，中國之有晚報是他創始的。中國晚報就是他畢生精力所經營的新聞事業，直到遭遇着意外，死在長江裏一隻失慎的輪船上。）

八 出版的嘗試

「禮拜六派」時代的作品，大體可分作三種：短篇的小說，文言的多于白話，大部分是以戀愛爲題材，所謂「鴛鴦蝴蝶式」。青年人的身邊瑣事，除開讀書就是講戀愛。便是年齡大些的名作家，也以吟風弄月，談嫖說妓爲主體。換句話說，一定要「風流」才可以稱爲「才子」；一定要進出娼門，才配稱得起爲「洋場才子」。因此短篇小說，都難免千篇一律的哥哥妹妹式的了。筆記小品，大都是因襲清人筆記

的傳統思想，以談鬼說怪爲主，偶然涉及于清室權貴或前朝名人的軼事。這類筆記容易寫的原因，是「死人無對證」。再次一等的是抄書，所謂香豔詩話，客中消遣錄等，可以說不必你自己用腦力。比較艱辛的寫作，倒是被新文藝作家所瞧不起的「章回小說」。無論牠的題材是一般社會的，或是娼妓生活，甚至戀愛故事，這其間都是作家日積月壘的經驗閱歷所匯，沒有實生活的體驗，是寫不出這洋洋四五十萬言的東西的。所以，如果你對于這個作家的生活淸楚些，老實說在他寫出來的一部小說中間，都可以找出每個影射者的眞姓名和每一段故事的眞史實來。這看似容易，而實際上不是初出茅廬未曾飽經世故的人所能隨便寫得出來的。

從民三冬到民五秋的三年間，我的寫作興趣非常濃厚。一方面天天加油(閱讀)一方面天天生產(寫作)，從沒有間斷過。所寫的東西——不配稱爲作品，就屬于小說和筆記一類。一個連常識都不夠的孩子，那裏會做得好的文章呢！到現在我連那時玩的什麼把戲，一點印象都沒有。不過寫得多，投稿的地方也多了，因而認識不

少的編輯和記者。

十七歲那一年，自己也辦過一種小型報——小上海。因爲報上刊登一篇從醫藥雜誌裏譯來的一篇關于性問題的文章，就被公共租界工部局以「妨害風化」罪勒令停閉。這時我們政府同租界當局的協定，還未簽訂，會審公廨的審判官完全以陪審領事的意志爲意志；奉行的是一種工部局特別替住居租界殖民地的民衆所訂的「奴隸法律」。被告的百姓是沒有上訴權的。——其實也毋許乎上訴，反正以他們的喜怒哀樂爲標準的，碰你的運氣吧！（這時報館的館址在牯嶺路的餘慶里，翻造過了之後改名爲人安里。不料時隔二十年，我在那里弄裏豎起了上海雜誌公司編輯所的招牌，倒是一樁有趣味的巧合。）

小報雖關門，而雄心不死！又借了幾百元的債，出版兩種雜誌，一種是「小說林」，一種是「滑稽林」。

發行書報，在我是毫無經驗，同時又沒有認識一位在書店裏服務的店員，更沒

有代理發行的雜誌公司。當雜誌出版後，就挾了幾百本，跑到各馬路上的報攤同書店，分別託他們代售。

「我有一本雜誌，請你們替我代售好嗎？」

「好的。」

就這樣隨便的交給他幾十本幾百本。自己沒有送書的回單，也不曾向別人要回一張收條。而他們呢，也似乎欺我年青不懂事，也沒有給我一張收貨條子。當時，也許你肯替我代售，已經是給我「面子」了，根本沒有想到什麽手續不淸。自此以後，天天跑去探頭探腦的張望，倘使有個人拿着我的雜誌在路上跑，眞會想跳過去和他握手哩。

到了月終，跑去收賬，結果是一無所得。

「我不認識你，沒有憑據，不能將書款平白地交給一個陌生人！」

對！理由很充足。「當時你爲什麽不給我一張收條呢？」

「你幹麼不向我要呢？」他們說。「也許我們是有收條的，不是你？總之，不認識你！」

話愈說愈有理由，你同他拚命麼？這孩子。

裝滿了一肚皮悶氣回來，晶亮的銀圓變做有字紙；再從有字紙變做法幣鑽進別人的荷包裏。

你有什麼話可答辯呢？同他拚命麼？這孩子！

於是乎我又做了一回「回湯豆腐乾」，負了一身債，回到鄉下。

這是我廿五年前第一次從事出版的嘗試的失敗。後來創辦上海雜誌公司時，特別注重「代理發行」這一項業務，就是回想到這時候被人欺侮時的痛苦，要替有出版興趣而沒有發行經驗的同志們解決他的困難。所以，最多的時候有過四十多種雜誌的「代理發行」，也有過相當好的成績。（所以不能做到十分滿意者，也自有他的困難之處，非局外人所能明瞭的。）

九　從酒保到編輯

投稿還是沒有中止過。

當時所用的筆名很多，「靜廬」二字還是我從民國五年起才用的筆名，直到現在，已經成爲我一個正式的名號了。

十九歲的上春，我的哥哥同朋友們合股開辦一家小醉天酒館在浙江路上。（這家酒館到現在還健在着）母親叫我出來充當外賬房，是專門記錄花彫一斤，燙麯一

碗的起碼賬房，每月薪工四塊錢。這個職司非常煩雜，工作時間又長，足足要十六個鐘點。然而，在這樣的環境下，我居然還能夠寫小說，並且寫得很快，平均每二天完成一篇。刊登最多的是上海中外日報的副刊上。主編這副刊的是夏秋風先生，他待我很不壞。

進小醉天酒館充任外賬房的職司，完全是失業期間飢不擇食的濫竽行爲，不僅與個性不適合，就是我的商業技能也夠不上任這樣的職務。說來應該自己慚愧，當過商店棘習生的人連商業上的起碼技能都沒有學會。在那時要會識銀洋的眞假，成色的好歹；以及賬務的格式，記賬的迅速等等，我都不理會。這樣要想做一個普通商人，老實說是不夠資格，雖則是一個「酒保」。因而對于每天收進來的假鈔票銅銀元，時時發現；晚上并結「現市」，不是有餘，就會短少。

這錯誤，除自己商業技能不純熟，興趣的不適合外，在賬櫃上面寫小說，記了這個，忘掉那個，是直接的原因。這賬房位置之不能久長，肚子裏明白。雖有間接

的股東關係，倒底是一時間情面不能長久維持下去的。四個月之後，我找到了一個國文函授學社祕書的機會，就自動告辭出來。

說起這國文函授學社，在民國五年到七年間倒是轟動上海文壇的一件大騙局。社長劉××，也是一位青年的作家，他好名之心很切，爲想出名，就不擇手段了。那時上海神州日報副刊編輯是錢寄生（曾編印上海黑幕大觀）和他相熱，他也時常在那副刊上作些香豔體隨筆。有時也代替發排稿件，等于是個不居名義的助理編輯。一天，他忽然異想天開，在發稿的時候，用章秋谷的名義夾進去一張主辦國文函授學社的新聞。神州日報在當時也是叫得響的大報，讀者很多，章秋谷的大名是張春帆先生所著的九尾龜小說中的一個主人公，風流自賞的才子，在書裏寫得他很不錯，讀小說的人很多明白這是漱六山房主人的自己的影子，存相當的好感。這一百萬言的娼門小說九尾龜的確銷得很廣遠。劉先生冒用這假名，就是抓着這一點。于是在這條消息刊出之後，就有不少崇拜這位風流才子的讀者們寫信要求入社或索取社

章。事有湊巧，劉先生有一位舅父也是姓章，住在南成都路沿馬路二開間的石庫門房子，他就用了這「章公館」的地址作爲社址，當然，更能使讀者們信任，這一位章先生就是九尾龜裏的主人公章秋谷了。報名和索章的人愈來愈多，一個人（出乎他意料之外的）來不及應付了，就親自到小醉天來聘請我做學社的祕書。當時，我對于「酒保」職業正感到厭倦，寫作的興趣非常濃厚，認爲捨此就彼對于我的身心都很適宜的，就答應了他，搬進「章公館」裏去住了。

中國文壇上有個偉大的偶像，受着幾千萬讀者們的崇仰，那就是畏廬林琴南先生。劉先生自己很明白，他的幻術總有一天要被戳穿的，且很短促；到了分發講義的一天，就是他的西洋鏡戳穿的一天，要維持，非別尋一位台柱子不可。因而想到了林琴南　他住在北平，對于上海的文壇上的情形非常隔膜。「君子可欺以其方」在他老人家前掉什麽槍花呢，他是懂不到的。章秋谷於是就同他通起信來，更附去一部（他的大作）九尾龜請求批評。果然林先生上了圈套了，應許他担任這學社的社長

名義，並允許撰述國文課的講義。

不多幾天，上海各大報上都用着林琴南主事的國文函授學社招生的大廣告，來報名和索章的人，眞是戶限爲穿，一天的信件，總有千封以上。經過二三個月的籌備，報告上學的不下二千人，以每個人十二元（六個月）學費計算起來，已經有二萬多元現鈔。這數目在一個流浪文人的手中是很鉅大的。有了台柱足夠號召，有了錢財，更有辦法了。就分別聘請幾位名作家，担任撰述講義的講師，如吳東園的詞學，王鈍根的新聞學，天虛我生的詩學，開始發授。這時候，他已經有了基礎，似乎不需要再頂替章秋谷的假名，就將自己劉××三字拿出來任爲副社長。但是對于林老先生的通信上有時還署着章秋谷的名字，有時也用××二字，就算是他新起的一個「別號」。

三個月的祕書任內，看穿了他的把戲。青年人有的是正義感，這樣的騙局當然不會贊同，甚至深惡而痛絕之，天天想離開他另找一宗適合個性的職業。（後來這

學社弄得很發達，居然也有人想參加進去，像李××，也掮過副社長的名義。因錢的來源太容易，浪吃浪用，變成外強中乾。結果，還是一逃了之。連同後來參加的人，也一同逃到北平去，改名換姓。民國十三年我進商報後，曾在副刊商餘上做過一部文壇燃犀錄，就是將這件事作骨幹來描寫當時所謂洋場才子的形形色色。不料祇登出三回，就被副經理徐朗西先生干涉而腰斬了。徐先生是在北平時認識他的，接到他要求不登下去的信。）

就在這時候，有一天，我忽然得到一位天津朋友的來信，並附給我幾份在天津出版的公民日報，報上面居然也刊載着我的小說。在當時，外埠的報紙轉載上海報紙上的文字，原是很通行的，尤其像中外日報，根本銷不到平津一帶去，將這種報紙上所刊登的文字轉載過來，更不容易被讀者所揭穿。這是當時內地報紙很普遍的現象。

我的小說會移植到公民日報上，就是這個原因。入世不深的我，不懂得這樣與

妙，又驚又喜地寫了一封長信給該報的經理先生，提出質問。

出乎意外地，居然來了回信，信尾是劉揆一先生署名的，着實嘉奬了一番之後，他說——

「本報即將擴充篇幅，如先生不憚跋涉，願聘先生爲副刊編輯。」

末了，還註上一筆——

「因社中經費支絀，請半盡義務，月致車費四十金。」

天呀！這是在做夢麽？「四十元」，這在我是做夢也想不到的。當天捧了這封信去找我頂要好的朋友王瘦桐，就由他的父親一手照料之下，在一個秋高氣爽的黃昏時候，登上開駛北洋班的盛京輪船。

那是第一次一個人走遠路，在四日夜風浪顛簸中總究到達了華北唯一大商埠天津。

公民日報是反對袁世凱帝制陰謀的華北國民黨機關報，開在日租界旭街。那時

大公報正被封閉，這張報紙的銷行也不能達到東馬路的中國地。然而居住中國地的讀者，以一毛錢一份的代價，還能偷偷地買到。經理是曾經出任過農商次長的劉揆一先生，主筆是劉鑄生先生，都是湖南人。在館中祇有我一個浙江人，年齡又輕，他們對于我都很好，尤其是劉先生，他期許更殷切，儼然像一位慈藹的父親。

公民日報雖是討袁期的華北國民黨的機關報紙，同時也是黨員的通訊機關，有不少的黨員進進出出。然而我却始終是個局外人，沒有思想，也沒有主義的信仰，渾渾噩噩，除每天做我應做的工作以外，就獨自坐在日本公園裏看書。副刊是沒有稿費的，所以投稿的人也很少，因而連一個寫作的朋友都找不到。

不久，袁世凱暴卒，黎元洪復任大總統，討袁之役告一段落。報館也從天津搬到北平去，在宣外米市胡同，每天改出二大張，仍由我編輯副刊，同時更助編新聞。這是我做新聞記者的開始，對于新聞紙和記者生活感到興趣的開始。

在很難得的幾位投稿人間，我認識了一位朋友——王梅魂，他是閩侯人。（後

來我在泰東圖書局編輯部時介紹他進局，曾與郭沫若曹靖華二先生發生意見，磨擦得很厲害，就是創造十年上集裏所寫涉的「王八旦」。）

張勳復辟的前夜，報紙停刊了。我不得不背着舖蓋，仍回老家。

十 荒唐之夜

回到鄉下不久，就結了婚。

秋季應鎭海覺民小學校之聘去當國文敎員。我的個性是浮動的，在冷板凳上，眞有點坐不穩當，不待學期終了，又跟着一位親戚上山東去做販棗子客人。

我之肯去販棗子，動機不是想賺錢，是要借此機會，走走老殘遊記上所走過的路。一半是好奇，然而多跑一處生疏的地方，多增進一些新見識，于年靑人總究是

有益的。販棗子對我是外行，當然更談不到賺錢。

從濟南到聊城有三天的旱路，那時沒有公路和汽車，要走，就得搭騾車。正是青紗帳起，魯西一帶是多匪區域，旅行感覺相當的困難。我們齊集了四十多輛騾車，請了一連兵保護着。一路上，茅店鷄聲，板橋人跡，倒別有一番風味。住上二個月，又經親戚的介紹，改進津浦運輸公司充任文牘，于是，一個人乘着一輛獨輪手車，在廣漠的大平原中走了三天，重回濟南。

這家公司是新創辦，還沒有開始，設籌備處于商埠一馬路一家旅館裏。閑着，就去西門大街的書舖子當巡閱使，或到趵突泉聽一「聽不懂」的梨花大鼓。嗑瓜子，喝香片，學學名士們的雅致。

一天晚上，被一幇客家帶到商埠一家裏妓院去消遣。逛窰子，這對于我感不到興趣的，爲湊着熱鬧，應許主人的邀請權充「牌局」的陪客，檯面上用的是「籌碼」，主人沒有說明是多少底的，我也不便去詢問他。在這種場面上，頂重要的是

「面子」，尤其不該講到「錢」，顯示你的小家子氣和寒酸相。

沒有規定「圈數」。打完四圈，接上四圈，一直打下去，足足打了一個晚上。陽光染紅了緋色的窗簾，呵欠帶在每一個人的嘴上，該是休息的時候了。主人過來檢點堆在每一個客人座位前的籌碼時，才使我嚇了一大跳，——輸掉了三百八十多元錢。

公司還沒有開業，即使開業了，以我的職務而論，薪水最高也不過二三十元一月。那末這一場莫明其妙的應酬，不是已經輸掉我整整一年多的生活費麼？想到這裏，後悔已是無補的了。我摸摸錢袋裏，還剩有三十多元現錢。于是情急智生，撒了一個謊，就奔到濟南車站買了一張三等票，冒着滿頭打下來的雨雪，丟掉了行李和書籍，毀棄了職業和名譽，別兮濟南，一口氣到了下關。

有一位父執——鄭茗友先生——住在下關任着升順經租處的經理。我投奔他。這使我永生不能忘懷的長者的恩惠。在我的記憶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

當我見到他老人家時，我很誠實的供述這一次荒唐的經過，有着不得不逃奔的苦衷，準備接受他的訓斥。——我這樣做，以爲最多不過給他責駡一頓而已，總不能不給我飯吃呀！我是他的子姪行。

出乎意外，他捧着水烟袋很安詳地咯碌碌咯碌碌的吸着，聽完了我的供訴。

「這是青年人容易觸犯的過失，不必怕，也毋許慚愧。問題祗在你能不能記住這過失？……」

從他慈祥的態度下我放平了一顆虛懸的心。我眞慚愧呀！慚愧我不了解他老人家的偉大。

我就住在他的舖子裏。過了一天，他給我一扣商務印書館下關支店的取書摺。

「買書的錢都記在摺上，我會替你歸還的。」這時，我眞感激得流下淚來。我還有什麽話可說呢，除埋頭攻讀之外？

（但後來我又是一次爲了打牌，幾乎弄到破產。現在想起，眞對不起這位長者

的好意，有負他老人家的期許。）

開始，我讀着説部叢書和資治通鑑；終于讀完了説部叢書和資治通鑑。

在下關度過了一個嚴寒的冬天。不，在慈祥而溫和的長者之前，我忘掉了民國七年的一個冬天季節。

第二年，我的父親去世了。

父親是痛惡穿長袍大褂和掉筆桿兒的任何人，對于我，也不能例外。

十一 「六三」運動

失業了，一直住在鄉下。

我們鄉間流行着一句俗話：「帶魚兩頭尖，賺得錢來是神仙。」像我這樣旣不會賺錢，又沒有恆業。——從民國元年起經過二度「回湯」，掉換四五回職業，沒有保守過一年以上的。這在鄉下人勢利眼光下，眞是一個不長進的孩子；就是家庭之間，也漸漸地瞧不起我了。

從父親去世之後，我和太太及剛生下地的第一個小兒——鴻志，在哥哥的豢養下，已經不堪生活下去了。家庭間的悲劇，永遠在我心版上刻劃下一條深深深深的傷痕。無論如何，我不能再寄生下去了，我決心要離開這大家庭，再度到外間去過流浪生活。也許會在流浪期間遇到較好的機會。

剛巧，「五四」運動的風潮起來了。很快的，從新聞紙上從北平，上海，寧波傳到我們的鄉下。每一社會角落裏都掀起了騷動。當然囉，像我這樣抱着一肚子抑鬱，燃沸了一身熱血的青年，更賦予莫大的同情。再也不忍受下去了，我要衝破這封建的樊籠，我要改造惡劣的環境，——用我的血和力，創造新生命。

向三姊借了三塊錢，悄悄地跑到上海。

這時，上海方面爲響應「五四」剛爆發「六三」運動。——罷市，罷課，罷工。

楊瑞葆先生是個熱心的商人，他正以商店店員爲基幹，號召組織救國十人團。從高昌廟到閘北，普遍地組織起幾千組十人團，更由每一組十人團爲單位，籌備組

織成一個聯合總會。

這一天，聯合總會預備舉行成立大會。每團推舉代表一人，在四馬路廣寒宮樓上，先行召開團代表會議。我由鄭義方同學的介紹，得參加這幹部組織。在會議席上議決創辦一張救國日報作爲十人團總會的宣傳機關。因爲我曾經有過當編輯的小經驗，這工作的責任就落在我的身上。

奔走幾天，總會組織成了，會所租在白爾部路新民里。救國日報也就在這時候出現於報販的手上。——吃飯問題總算暫時有了解决。

「六三」運動過去了，接着就起來一個七省請願運動。以反對西原借款，取銷四路合同，罷免段祺瑞，解散安福系武力邊防軍爲目標，號召七省工商學界推舉代表入京（北平）請願。

這種請願運動，北平學生界曾經先舉行過，但沒有獲得效果，且還打傷了幾位學生。像馬駿劉清揚兩先生，都曾參加過這次運動的。安福系的勢力已根深蒂固，

大總統徐世昌又是依靠段氏的抱腰，賴着四路合同的日本借款而上台的。更有着邊防軍的武力存在着，要打倒，要罷免，僅僅靠北平學生界的力量是不夠的。——這個目標太大，不同「五四」運動時的打倒曹，陸，章——非要發動全國各界的力量，是不容易達的到。

那時，上海學生聯合會的會長是蔣保釐先生，學生聯合會日報的主編是潘公展先生。他們大體同意這個運動。

終于在學生聯合會的會所裏召開了一個大規模的聯席會議，從這會議席上推定了下列四個北上代表參加七省請願運動：

馮復光（全國學生聯合會總會代表）

裴國雄（上海學生聯合會代表）

唐××（上海商界聯合會代表）（註七）

張靜廬（救國十人團聯合總會代表）

四位代表中，對于平津一帶的地方情形，我堪稱為識途老馬。民國八年九月二十日我們都在天津各界聯合會報到。現在還能記得起的，有南京代表劉英士先生，湖北代表施洋先生，天津代表後來在長沙被槍斃的黃愛先生——那時他的名字不叫黃愛。還有濟南的，烟台的，共佔七省市區。

在天津開過幾次祕密會議，都是在夜深舉行的，地址在法租界一個教會的地下室裏。三四天後，我們一同出發到了北平。

第一次派我們三個代表團的代表，去訪問北平學生聯合會的會長張國燾先生。他住在馬神廟，是北京大學的理學院學生。

從他的談話中，堅決的反對我們這一次的繼續請願運動。

「我們北平的學生已經受過教訓了，這是與虎謀皮。」他不贊成這次運動，所以他不主張北平學生會再派代表參加。「但是我們決計號召全體學生和市民，在外邊加以聲援。」

因爲北平學生界不參加，裴國雄也聲明退出代表團，回歸上海去了。

再經過幾度祕密會議和歡迎宴會之後，我們會集了三十個代表，推舉烟台代表爲領導人，——他是一位年已六十多歲，長着白鬍髭的老人家。

起草呈文，簽蓋姓名和印章，決定十月一日上午八點鐘在中央公園的來今雨軒會合。

（註七）唐先生名字忘了，他是七浦路商聯會代表出席上海商總會的。

十二　大鬧新華門

由于上次請願所得到的教訓，預測這一回的效果，是很渺茫的。或許還會受到更厲害的處分：一打傷，二監禁，三槍斃。憑良心說，這三十個代表，都是單純的愛國行爲，沒有政治的背景，也沒有什麽信仰和主義。倘就這樣的被槍斃了，也還覺得是值得的，可以引起全國人民對于安福系的惡感。

魚貫地從中央公園出發，很順利的踏進新華門的東轅門。

新華門內圈有三個朱紅色大門通過中海到達總統府。這時總統府的衞兵，已經將左右兩面大門關閉起來了。我們推出領隊的老人，將一份正呈文遞交傳達處，要他們送進去。

傳達處收受了呈文，但並不專誠送達，讓牠睡在一張古舊的桌子上，表現着一種極難堪的面目，自顧自同伙伴們談天；偶爾以討厭的眼光掃射我們一下。

在沈悶的空氣中，度過了四個鐘點。太陽立正每個人的頭上。轅門外面學生和市民們已經愈聚愈多了，很多的新聞記者，用鏡頭鑽進鐵欄杆的花孔裏，不斷地攝影。

肚子起了叫聲，心頭慢慢地焦燥起來了。

「幹麼不將我們的呈文送進去呀！」老人質問傳達處那個滿臉橫肉的傢伙。

「急什麽？總統在開會哩！」

傳達處傳出來一陣電話的鈴聲。空氣比前緊張起來。東西轅門的鐵門關閉了，

衛兵們都集中在新華門的正門高過人腰的地檻前邊。——我們還是靜靜地等候着。倦了，三三兩兩地坐在石階沿上。

三點鐘，總統府裏派出來一位國務院參議曾毅，坐在候客室裏要傳我們的代表之代表談話。

「祇准派一個代表同曾大人談話！」傳達員高聲叫着。

代表們起了一陣騷動。「放屁！我們這麽遠跑來，不是要同一個參議談話來的。還說什麽一個人！」大家不去理他。

曾參議討個沒趣，進去了。沒有下文。

候着，候着。

傳達室裏的電話鈴聲又是一陣亂叫。衛兵們都上了雪亮的刺刀，形勢更加緊張了。刺刀的光亮一閃一閃的使人瞧了眼花。大家有點不耐煩了。

「衝吧！我們不能老這樣等着，非衝到總統府去不可！」一個代表站起來說。

「對！」

三十個人，——四個女代表在前邊，直向正門前衝了過去。外面起了一陣雄壯的呼聲，聽不清什麼話。

衞兵們退進了新華門，將僅有的兩扇朱紅大門也關起來了。又是沒有下文。

電燈吐出暗黃的光輝。曾參議第二次出來了。

「呈文見到了，國務院已經停止辦公，你們都囘去吧！」

「什麼！就這樣的對待我們麽？」代表們再也忍不住氣了，有一個女代表，突的跳上蹲在轅門邊的石獅子身上：

「徐世昌老王八蛋！……」

四邊隨着起了一陣熱烈的掌聲。

「打倒賣國殃民的安福系政府，打倒這老而不死的王八蛋！……」

又是一陣熱烈的掌聲。這時我們都認爲是沒有什麼希望了，三十個人很快的分

成四組，攀登四圍鐵欄杆上，大家都不客氣地向圍觀的羣衆開始演說，喊着口號。

轅門老早下着鎖，不許人出去，也不許進來。足足一天了，沒有喝一口水，飢火和憤火燒着了每個代表的心頭。

到十二點鐘過後，東轅門忽然開啓了，昏暗中起了一陣急促的皮鞋聲，進來二百多個荷槍實彈的警察大隊。很整齊的排列在石階沿前。

「我是警察總監吳炳湘，告訴你，如果你們不滾出這個門，我就不客氣了。」—不知什麼時候從人叢裏鑽出來一個胖得像猪一般的老頭兒，用着宏亮而粗暴的口音，向我們訓話。

「滾！……滾你的蛋！我們是中華民國的主人翁，站着中華民國的土地上，你敢怎麼樣？……」—有一位代表抗辯着。

「好！」—就在這一聲好字下，警察隊的後面更竄出一羣便衣的偵探，用一條細長的麻繩，將每個代表都上了五花大綁。

「打倒賣國賊！擁護請願代表團！」站在四圍的羣衆，吼着口號。我們也在裏面應和着；但是每個人的聲音已經啞斷了。

北平的警察究竟還有相當的政治認識，不知他們是眞意呢還是矯作的，當我跟隨他們——每五個人押走一個——踏着去警察廳的路上時，輕輕地在我的耳朵邊說着：

「不要緊的，不要怕，你們是愛國的，我們奉了命令，沒有法子呀！請好走，請好走！」

雖然我們在來今雨軒集會時，已經早猜想到會有被拘捕的一着，並不害怕；但是，對于他們的安慰，不能沒有相當的感動。

進了警察廳，鬆了綁，警察們忙着招待我們坐在大坑上，更爲大家倒了幾壺白開水。

各人都放了漲滿小肚子裏的一泡尿。

十三 「誰是主唆者」

還有一份副呈文被偵緝員在烟台代表身上搜抄去了。

以地域論，上海是七省區中比較遠又比較大的都市，所以在呈文的署名次序上上海寫在第一行。

以上海的四個（實際祇有三個）的代表年齡上我比較叨長了一二歲，于是在呈文的代表名列上我被寫在第一行。

這樣，從呈文的形式上看起來，這一行的請願代表團我變成爲一個領導人了。——其實這是誤錯的，我們的領導人還是長白鬍鬚的烟台老人家。

但是，他們似乎不清楚，於是一聲呼喝——

「張靜廬！」

我就被如虎如狼的偵緝員，連拖帶走的從代表叢中提了出來，擁到一間很寬敞的審問室。

上面坐的當然還是這位自稱警察總監的吳炳湘先生。

我們在吳友如氏許多畫寶中看到過清朝衙門的「大堂」，長長的高高的案桌，遮着朱紅色的桌衣，右面放置兩隻籤筒，插着塗上紅色藍色的長竹籤子，中間一隻鉛盒子裏放着二方硯台，朱砂的和墨的。山字形巨大的筆架上，躺着一枝朱筆一枝墨筆，左面一塊警堂木。

沒有看到刑具。——後來曉得上刑是在另外一間屋子裏。

八個上着刺刀的衛兵，雄糾糾地分站在案桌前的兩邊。犯了愛國罪的犯人就被推在衛兵中間，對準了案桌前站着。

問過了一遍姓名年齡籍貫之後——

「你們這一回到京裏來搗蛋是誰的主唆？」

「……………」這一句奇特的問話，使我噤住了。「這全國的人民一致反對的賣國行爲，還待有人出來主唆嗎！」我心裏這麼想着，可是沒有說出口來。

「誰是主唆人？」拍！拍！驚堂木響了二下。

「……………」

「說吧！……」這聲音響得連房子也似乎受到震撼，四壁起了一陣回聲。

「好嗓子，」我想，「如果唱大花面，一定可博得全場的彩聲。」我意識地退下一步，怕他還會吐出比這一聲更宏亮的問話。

「……」他沒有說話，祇將驚堂木連續地敲了幾響。過了一刻。

「沒有！……」我說出這樣半句脆弱的答語。我不明白，這時候爲什麼不說出比這更充足理由的囘話呢？也許被他的驚堂木的聲響將我要說的一篇大道理打斷了。

「什麼？……王八蛋！王八蛋！……」他用很熟棟的駡人的辭句，不斷地吐出來，同時將驚堂木也不斷地拍着。

我仍舊被推囘代表室裏，「王八蛋！王八蛋！」的聲浪一直追跟到進了屋子裏。

第二個第三個同樣的被推出去，被推囘來。

在屋子裏遠遠地可以聽到駡着王八蛋和驚堂木的聲浪。同樣的可以見到每一個被審問的代表，漲紅了臉兒囘來。

沒有被審問完畢。我們九個人先被幾個偵緝員綁上了繩子，向進來時的大門推出去。

「槍斃嗎？」我想。承送行的偵緝員的扶掖，爬上兩輛預停的騾車裏。

巳經是夜深了，路燈睜開牠朦朧的睡眼，騾子受着兩下淸脆的鞭策，四隻蹄子

略略伸縮一下，就一拐一拐地拖動了我們九個身軀，向前門大街而去。

「上天橋嗎？」我低低的說。

「那當然是去槍斃。」坐在我前面一位代表接着說，「達到目的了！」

大家發出一陣不自然的笑聲。當時，我似乎沒有感到死的可怕，連怎樣槍斃，槍彈打進去之後，怎樣倒下去，也一點都沒有想到牠。

「怕送到保定去吧？」還有一位說，「剛才不是有個警察說城裏的監獄關不了這麼多人嗎？」

大家都沒有響。意思是槍斃也好，送到保定去監禁也好，反正是「預定」的。蹄聲衝破沉寂的空氣，車輪輾着砂石子，發出殺殺的聲音。偌大個北京城，整個都睡着了，連狗的叫聲也沒有。

大家感覺有些倦意。是的，太興奮了，這時候該好好地睡一晚。

又是兩聲清脆的鞭策聲，騾車拐了個灣轉進一條小胡同。

「下來！」一坐在車前和車夫並着肩的一個武裝警察跳下了。屋裏竄出了十幾條大漢，將我們拖進一間昏暗的小房子裏。

一陣霉土難聞的氣息撲進鼻孔，打了個寒噤。

脫下長袍，解開衣鈕，褪下褲子，襪子，鞋子。每個人都經過詳細的檢搜。

「銀洋交給我！」一個偵緝員說，「連褲帶掛襪帶子一起解下來。」

很馴服的點交過了。

「隨便躺吧！」他很客氣。巴不得這一聲，於是我們就爬上靠壁木板上，橫七豎八的躺下來。倦了，一合眼就有人吐出呼呼的鼾聲。

「傳張靜廬！」朦朧中聽到有人呼喝。接着有人將我推醒，兩個人挾住一個，拖到後面一個院子裏，——又是「大堂」。

「啊唷！啊唷！」隔院傳過來一陣慘痛的呼號。我被驚醒了，揩揩倦眼，仔細地瞧瞧這「大堂」的輪廓，還是一個樣式的。坐在中間的一個瘦長臉兒小髭鬚的長

官。——東洋鬍髭，像街上所貼的仁丹廣告牌。

後來打聽到這就是×隊長，北京的偵緝隊長，殺人不眨眼的人間活閻羅。

還是這麼一套：——姓名，年齡，籍貫。

「誰是你的主唆人？」

「沒有！」

一陣驚堂木。

「滾下去！」可是，沒有「王八蛋」。很有禮貌，不比吳總監粗魯，似乎他的嗓子也沒有唱大面的來得宏亮。

照樣的被推回拘留室（這回不是代表室了）。別一個同胞被熬煎的慘痛的呼號聲還是不絕的從隔牆傳來。

第二個，第三個…………

眞的倦了，納下頭便呼呼地睡着了。

「傳張靜廬！」—又是一聲呼喝，于是又被拖到「大堂」下。

姓名，年齡，籍貫，還是照樣的一套。

「誰是你的主唆人？」

「沒有！」

接着又是驚堂木拍了幾下，又是連拖帶擁的送回拘留室。

第二個，第三個…………

靠院子有一個方形的小洞（夠不上稱牠爲窗），透進了淡白的陽光，天亮了，就是要再被審問，也得要睡他一下。

醒來，已經吃中飯了。——一大鍋子的豆腐白菜湯，每人一大碗大米飯。整整一天了，吃到這一頓飯，格外的香軟。

看守的是位健壯的漢子，對待我們似乎很客氣。「你們是愛國的！」—他嘴裏常常這麼說着。

屋子是矮矮方方的一間，門是木做的欄杆，像放大的鳥籠，也像牛柵。進進出出都要將木欄杆推上去，放下來。這一點未免有些別緻，同普通的住宅不一樣，看到牠眞有些不順眼。爲什麼犯了罪就應走着這樣鳥籠式牛柵式的門呢？我不懂。打樣的建築師他心裏明白，也許這就表示牠是監獄，而不是你的家。

十四　踏進出版界

代表團的人數是三十個，被拘捕的據說有三十一個（另外一位是從天津跟來的記者），分別監禁在三個處所：關在偵緝處的，是待遇最惡劣，也是他們心目中認爲頂不馴良的九個。其中有一部分在警察廳裏，一部分在保安處裏。——後來聽說關在保安處裏的有散步的自由，有浴缸，有四碗小菜的飯食，這比住北平學生們常住的公寓還舒適。關在警察廳裏的，食用也很不壞，原因是外間不明瞭情形，以爲

我們三十一個一起關在警察廳裏，所以時時有團體送來的慰勞品，食物和用品。結果，他們幾個人吃不完，用不了，且分送給看守的警察們。

我從上海動身時，天氣還相當暖和，穿的是夾袍，也沒有帶被褥。當天在拘留所睡了一夜，第二天就被寒氣襲醒。北方的天氣，當然比較冷，聽說唐山已下了微雪。這間拘留所祇有一個小圓洞，地下發着濃烈的霉味的泥土氣息，永遠透不進太陽光；坑的泥壁上，橫橫豎豎抹滿了臭虫的血痕。柵門外是檢查室，每個「罪犯」進來時都先得站在那裏「抄靶子」。泥壁的那一面是「用刑室」（這是我杜撰的）我們可以清晰的聽到慘厲的叫號聲；同時也常常看到長而細的用銅絲纏成的鞭子，黏着鮮紅的皮血，顫顫地閃過我們的「洞口」。

我們很僥倖，沒有嘗到這鞭子的風味；否則，「誰是你的主唆人？」我們，一定能夠很快的吐出九個不同樣的姓名來，毋須乎再勞動吳大總監的肝火了。

總究還是「愛國犯」，在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交涉結果，以每天一毛錢的代價，

租到九條極污臭的被褥。更容許我們每天化一元錢買到二份當天的報紙。還時時可以用高價買點牛肉燒豆腐白菜湯吃。

在報上，讀到吳佩孚從洛陽打來的電報，和唐繼堯從雲南給靳雲鵬內閣總理的通電。總算是得到勝利，爲着拘捕請願代表，摧殘民意的過失之下，靳雲鵬內閣倒台，龔心湛以財政總長資格代靳而組織新內閣。

不知是那一位「獄友」說過這樣一句話：

「唯有住在監獄裏的人，懂得鎮靜。」

坐監，是失業者最妥善的生活處所。除掉頭兩三天感覺不自由不舒適外，久了就一切都習慣了，而且很安適。——起息有一定的時間，飲食有規定的限度，不會給你吃得過飽，也不使你餓死。沒有人敲進門來討債，也無須乎付屋租和包飯錢，眞是再舒適沒有的了。不信，你瞧，住過監獄的人們不是都白胖胖的麽？雖則這白胖並不一定是健康。然而在失業期間，有一頓沒一頓，就怕連這不健康的白胖都不

容易有哩！

我是爲了失業，在家庭裏生活不下去了才跑出來的，幸運地給我進了這免費的「公寓」；久了，一切都習慣了，所以也不想就出去。——沒有主義和信仰，沒有鉄的紀律的團體是不會長久存在的，這時候我們所代表着的那個「十人團總會」也許早已經散夥，仍各自回去做他的本行生意去了！那麼我如果一旦被請出去，不是又要回到生活不下去的大家庭裏去麼？這次回去更難，頭一次到北平是當編輯，這一次却是來坐監。鄉下人有個標準觀念，「坐監的總不是好人。」雖說是「不到此地不算英雄漢！」然而這不過是「英雄」們聊以自慰的自我宣傳罷了，誰會恭維這坐過監的「英雄」呢？何况我，大家都曉得並不是「英雄」，卽使也坐過監，還是冒充不了的。

是不是別人也有我同樣的感想，不淸楚；然而四十八天的拘留生活，却在鎭靜中平穩地度過了。

「請你們今天都出去了，廳裏來的公事。」那位已經變成爲我們的朋友的看守者，笑嘻嘻向我們道賀。

說走就得走，你不願意也沒法子。

經過北大，俄專，等的慰勞之後，被送到天津。馬千里先生是天津民衆運動的領導者，招待我們很周到；一直到濟南，南京，上海。慰勞儘管慰勞，失業依舊失業，一重心事又襲上我底心頭。

大家都明白請願運動是民衆最懦弱的表示，要打倒北洋軍閥是有待於更進一步的運動——革命。

國民黨起來領導了，孫伯蘭先生在上海組織全國各界聯合會，各地代表已絡續集合攏來。我居然被寧波各界聯合會領導人金臻庠陳荇蓀先生們所賞識，推舉爲出席總會的代表。——失業恐慌又得暫時解決了。

在會裏，我認識了一位上海的出席代表——趙南公先生。

他是泰東圖書局的股東兼經理，是充滿着亢爽豪俠的燕趙之士。那時他正在窮困掙扎之中，深深地感到自己精力的衰頹，和書店經營的不得其法，要想找尋一位相當幹練的襄理人。

在不多幾次的談話之後，我被他認爲理想中的助理者。

我開始主編一本月刊「新的小說」；從此我踏進了出版界。

如其說我有着想做個出版家的企圖，毋寧說是我有着愛書的嗜好。從少年時代起，我就喜歡「書」，到現在爲止，這個「怪癖」還沒有改進；因爲自己基本學識的淺薄，僅僅對於文藝一部門感覺興趣，所以我所愛的書，也僅僅限於文藝部門的書籍。所謂愛，不是珍本，古版，而是很習見的普通書；所謂愛，並不是想將牠珍藏在柚木的玻璃書櫃裏，而是買來看，看了就隨便放在枕邊，案頭，或書架上。無論牠是怎樣好的書，定價怎樣貴的書，想看牠就要買囘來，朋友們借給我的我不要，圖書館裏有的我也不去，一定要自己出錢將牠買囘來才願意看牠。有時看不下去，或

明明曉得沒有時間再看牠，還得要化一筆錢去買囘來，翻看一下目錄和序文，就拋在枕邊，到記起時再去翻一下。這樣，全不是爲想多讀書而愛書，爲要增進知識而愛書，豈非「怪癖」！（到今天止還不曾踏進過任何圖書館）

從民國元年起，我就做着棋盤街巡閱使，即是這「怪癖」的作祟；風霜雨雪之夜獨個兒站在書店的大玻窗前瞪着新書的封面，兩度「囘湯」想改行，唯一的希望是進商務印書館當練習生，也是這「怪癖」的作祟。

在出版界已整整度過二十年了，究根探源，還不是都爲着這「怪癖」的作祟嗎？

——我愛「書」。

十五　泰東圖書局的轉變

「新的小說」出版後，倒有四五千份的銷路。淺薄儘管淺薄，幼稚儘管幼稚，在當時，上海還正是「禮拜六派」小說盛行時代，一本不倫不類的上海人打話「半欄脚」一式的新刊物，能有這樣的銷數，確實不能說牠壞。

泰東圖書局的股東，多是與政學系有關係的。在民國三年創辦這書店時，出版計劃注重在政治方面的。後來討袁之役勝利，股東都到北平做官去了，無形中將這

家店舖交給經理趙南公一手包辦，他也出了好幾種「禮拜六派」的小說，像芙蓉淚等等。這時却大大靠碭塵因的「新華春夢記」賺了一筆錢。（雖是這一部書上賺了些錢，整個書店的經濟狀況還是很困難的）

他很明白這已是「迴光返照」時代，再過下去所謂「鴛鴦蝴蝶式」的小說書不再會走民國三四年的紅運的了。於是，他就決定放棄過去的一切，重建理想的新泰東。

我們如果是身處其境的人，就該懂得一家舊的書店，要放棄牠的上了年紀的舊的一切，轉變爲新的書店，眞是一件很艱難的事，還不如痛痛快快的另開一家新舖子來得容易得多哩！一家書店有一家書店的發行路線；等於說某一種書店自有某一種書店的發行路線。比如泰東，牠是出版「新華春夢記」一類小說書的，牠已經將推銷「新華春夢記」一類書的發行網布定了，書店的營業是靠「放賬」的，出版的書，委託各地販賣書店代售，賣出還鈔，很多的賣出了也不還鈔，於是乎有了「賬底」。這「賬底」，也可以說是「千年不還，萬年不賴」的長期欠賬。一家書店要先有了一層

「賬底」，然後可以逢節逢年，在「賬底」以外的欠款項內，收到了三五成已經賣掉了的書款。（自然，大資本的書店有了自己直接的分店支店，這痛苦就可以免掉了。）

出版一本書，在算盤上打起來，總可以賺錢的，而且賺得很不壞，那麼爲什麼有很多很多的書店會倒閉會歸併呢？爲什麼著作人自己撈腰包印行一本作品，到頭連「造本」都撈不囘來呢！這就是「賬底」的關係。換一句話說，就是說你要化上半年一年的精力，將賺來的錢來舖這「賬底」；沒有「賬底」就沒有人替你販賣。就使有人替你販賣，賣出之後還是不還你的錢。這「不還的錢」說來說去還是「賬底」。

泰東要放棄這現成的「賬底」而另行「打樁」，眞是相當的困難。

全國各界聯合會被法租界查封了。同時我還生了一場「大頭瘋」的怪病。（後來經寶隆醫院醫生的診斷，說是沒有陽光的「免費公寓」裏傳染來的。）病好了，就改進泰東當編輯。開始租在南成都路一個里弄裏，過了幾個月又遷到馬霍路德福里一

幢兩樓兩底的石庫門裏。

在初成立時，還有一位王無爲（新命）先生，一位王靖（梅魂）先生。無爲是主編「新人」雜誌。因外稿的缺乏，老是唱獨脚戲的。他的寫作眞敏捷，記得新人出過一期廢娼運動專號時，十幾萬言厚厚的一本，竟由他一個人化了十天十夜的工夫，分門別類將牠完成。王靖在譯託爾斯泰的小說集。

那時，我的思想近乎無政府主義，無爲也有這傾向。在行動上，他更實行不坐人力車，咯碌咯碌老是拖着一雙牛統皮鞋跑東跑西。一天跑幾回四馬路，也不感覺吃力。不久，他離去了。

搬到馬霍路之後，我又請了二位助理編輯——沈松泉和曹靖華先生。沈先生年齡頂輕，看見人總要臉上發紅。我同他相處得很好，差不多十年中沒有分過手，老是在一處工作的。曹先生對我也不壞，可是他很瞧不起王靖，常常吵嘴，來了不久就憤而辭職，到俄國讀書去了。待郭沫若先生從日本來當編輯的時候，我已經不

編雜誌了（新的小說從七期起由王靖接編下去），担任的完全是屬於出版部分的工作。因南公對我的信任，關於對營業方面的事務也叫我替他辦理。

我有愛書的怪癖，所以將一本書從付排到裝訂出版，都由自己親手照料，眞有說不出的快樂。而於營業方面的「生意經絡」，倒也感覺相當的興趣。責任的驅使，下雨落雪都要到太平洋印刷公司去走一遭。日夜工作，樂此不倦。泰東因經濟的拮据，工作人員的報酬是很菲薄的。一個月沒有一次整數發薪的事，總是絡絡續續在櫃上碰到有的時候隨便拿三元五元。他是馬虎不過的人；對編輯人也是如此，既不講明一定的薪水，也不講明在所裏（工作時間內）所做的文章和所外所做的文章著作應屬於誰的？雖是當時出版界還沒有抽版稅的先例，然而對於著作品的所有權當然應該劃分得清清楚楚。在那時書店的習慣法，凡是出了薪水的編輯員，在編輯所工作時間內所做出來的文章，其版權似乎都屬於書店的。（一般的較大的書店也是如此。）所外的屬於作家自有，仍可以另外作價賣給自己的書店出版。泰東根本沒

有這一套，既不講定版權問題，又不規定每天的工作時間，很自由地跑進跑出，也有儘一二個月不必做一篇文章的。

爲了這，從創造社出版部成立後，重新排印「少年維特之煩惱」，出版時有一篇郭先生的增訂本序，中間駡得趙南公啼笑不得，這在我們當日同在一處工作的人看來，未免覺得是非不明！因爲這是屬兩方面的事：一方固然囿於習慣，太馬虎了，但是另一方面爲什麼當時也不認認眞眞地劃分一下？豈不比後來爭論好得多麽？

沫若第一囘來泰東，大概有半年光景。我的家眷也住編輯所後一間亭子間裏。還帶着三歲的小孩——鴻志。他很喜歡他，常常同他一起玩耍。（現在這孩子已經二十歲了）他也同王靖合不來，同靖華一樣很瞧不起他，不過沒有當着面吵過架。「創造十年」裏的「王八蛋」，就是指着他。

十六　創造社的搖籃

為了生病，王靖請一位留日醫生打一支清血針，不知是針頭消毒不清呢，還是手術不高妙，打了回來，手臂當夜發腫，並且痛得很厲害。一個人在痛楚時總會不自主地喊姆媽，或是喊爹爹；可是很少有用罵人的辭句來替代呻吟的。然而，王先生卻例外，他愈痛得兇，愈會高聲地喊——

「王八蛋！王八蛋呀！」

這在我們南方人聽來（雖則他是福建人）未免特別觸耳！經他晝夜不息的喊叫，弄得滿屋子的人都感到不快，也感到別緻。因此病醫好了之後，大家都加上他這個別緻的綽號——「王八蛋！」

「王八蛋！」

他聽到了也不以爲意，有時輕輕地也回給你一聲——王八蛋！這是好玩，也是嘲笑他的意思，其間並不含有「罵人」的成分。否則，在同事間無論性情合不合，或是破了面吵過嘴，也決不會隨便用「王八蛋」來罵一位熟人的。

事隔十多年，故事也模糊了。不料因「創造十年」裏有這樣的一句——王八蛋，竟引起了一位某先生的誤會。我曾經爲這誤會，間接的替他們解釋過，人微言輕，似乎沒有什麽效力。

在我的手裏，替沫若印出一本「女神」一本「茵夢湖」。當女神付排時，他是主張用新五號字排的。——用新五號字印在潔白的毛道林紙上，眞是黑白分明，十分

美觀。可是，上海普通印刷所裏都沒有這種字體，我曾經跑到虹口日本人開的蘆澤印刷所去探問，開價要二元一千字排工，嚇得不敢成交；還是用的普通五號字體，普通的報紙印刷。以看慣了日本書的眼光來看，牠當然會引起他的不滿意。「茵夢湖」一付排之後，他又囘到福岡去了。

沫若走後，鄭伯奇先生來編輯所度過一個暑期，譯完了一本「魯森堡之一夜」就囘日本去。南公致送他一百元錢，也沒有說到版權或是版稅。

第二年，沫若重來泰東，因帶有太太和孩子們，不便一塊兒住在編輯所裏，由南公另外給他找一幢哈同路民厚里的住宅。（因那時田漢在中華書局編譯所，也住在民厚里。）房租和食用，都歸書店供給。同時郁達夫成仿吾李鳳亭諸位，仍住在馬霍路，「創造周報」就在這個時期出世的。

編輯所的人員加多了，一切的開支和各人的費用也比較增加了。泰東的經濟狀況向來拮据的，這時更顯露捉襟見肘的窘態。只是一種週報，卽使牠的銷路不壞，

也盈餘不了多少，何況還得貼本？因之，爲要顧全各同事的費用，就約定在中華新報上另編一種副刊——「創造日」，每月由報館津貼一百元編稿費。此外，他自己也謀到一個農商部的駐滬商標局長的官職，將收入的一部分補助書店的不足；同時也可以安插幾位朋友，減輕他的直接負担。達夫先生曾在那裏兼過幾個月的科長職。

泰東，是創造社的搖籃。——可以這樣說。泰東，在初期的新文化運動中間，牠是有過相當的勞績的。現在這古舊的書店，已經是有名無實，不堪回首了。

說到營業，當民國九十年間，雖然有創造社的刊物：創造季刊，創造周報，和類似創造社叢書的：沉淪，冲積期化石，玄武湖之秋，蔦蘿行等新書出版，但是，在那時候，書的銷行却並不暢旺；直到民國十二三年，洪水半月刊出版前後，這初期的小說書，和創造週報合訂本等等，都忽然特別的好銷起來，在這時期中泰東似乎才獲得了意外的收穫，報答他過去艱辛的勞績。然而不久，光華書局和創造社出版部都相繼成立了。

十七　外勤記者

黍東因爲經濟困難，對同事們的酬勞眞是微薄得很。我大約每個月可拿到二十元左右，但得三元二元分幾次在櫃上領取，在這種環境下，家庭生活的窘迫，可想而知了。那時我是兩個孩子的父親，。一家四口，另住在白爾路一間前樓上。到民國十年秋，承南公的轉荐進聯合通信社任外勤記者，担任的是團體活動的新聞，和會議席上的記錄，工作比較簡便，有四十元一月的收入。做得不久，又承李徵五先生

的推薦，担任香港中外交易所的文書股長，月薪是一百四十元，還可以自己帶一位助理員。在泰東，我與松泉的友誼十分親密。我離開泰東時，他還在繼續服務，然因家庭經濟狀況不好，曾經對我說過：「沫若答應替他譯一本童話集，想自己印出來，掙幾個錢仍回到中國公學去讀書。」（郭沫若創造十年續編說：「在夏天曾託我挪點時間出來，替他們（？）譯部小書。我答應了他們，便把安徒生的有名的童話沒有畫的畫譜，由德文重譯了起來。但到譯得只剩下一兩夜的光景，泰東的趙南公却把他們同時開消了。那原因，我至今都還不大明白，大約也怕是趙探聽到他們（？）有做小伙計賣買的消息吧。」大概就是指的這回事罷？）

爲什麽突然地會沒有下文了呢？這說來是很奇突的，不僅郭先生不明白，就連所謂「同時開消」的趙南公也不會曉得。

原來我接到李徵五先生的通知，已是晚上九點鐘了。「今晚就要下船，天亮要開的。」他說。祇有幾個鐘點，要整理一下自己的行囊外，還要找尋沈松泉，同他

一起走。一則，本來有個助理員可以帶，還能幫助我繕寫正楷。——他的小楷很秀媚可愛，而我的字體恰又挺不漂亮，所以以後凡遇到文書的工作，我總要他在一起的。一則，他的經濟狀況同我相等，老是不夠應付，弄一本小書是否一定可以掙到錢，還是渺茫！現在既有現成的六十元一月的助理員位置，何苦而不捨此就彼呢？因爲這兩個原因，決意要找到他。不料他這晚上回家特別遲，到早晨三點鐘，我們才在輪船上見面。因爲時間太匆促，各關係方面都未曾通知，在未得到從香港寄回來的報告信之前，很多朋友認爲是失蹤了。（當晚，正值我第二個孩子生下地，因匆匆離家，連小孩子的面都不曾見過。）

我向來對於一個書店職員，利用他的職位在外邊做「小貨」買賣，是很反對的。（到現在還是這樣；所以我無論當經理或是小職員，自己從來不曾做過一本額外的「小貨」。）然而這些事，在南公倒又不在乎，泰東的店員，很少不自己做「小貨」的。最有成績的如黃濟惠先生，靠一部新式標點的兒女英雄傳，開過梁溪圖書館。

其餘如羣衆，震旦，兒童等老闆，都是在泰東職員任內印行過書籍而後出來自撑門戶。不過因各人的經營手腕的不同，也有成功的，也有失敗的吧了。松泉的「開銷」一泰東，是臨時的決定，和這本「小書」無涉；與趙南公的「探聽到小伙計賣買」一也沒有關係。而且對於我的行蹤，更沒有一絲一毫的聯繫。

我之所以肯去充交易所文書股長的職務，完全爲的是錢。家庭的負担，生活的高壓，不得不使我拋棄興趣所屬的出版事業，而進入素所厭惡的投機市場。

交易所高潮很快低落了。我將松泉推薦給沈九成先生。沈先生很有大企業家風度，肯提拔青年人，因此居然沒有經過殷實舖保等手續，就派他在香港三友社担任助理會計；後來更由港社派遣到新加坡分社管理會計，有上萬的現金進出，並不加以疑慮。他走了之後，我經南公的電催，回上海進胡政之先生等創辦還不久的國聞通信社，担任採訪政治新聞的外勤記者。這位置是嚴諤聲先生的後任。初做外勤記者，而又要在渺無基礎的政治新聞圈子裏活動，確實感到有無從下手之苦。幸而這

時期，國會南遷，在上海設有一處通訊處，還有一個國民黨的通訊處，都可以時常跑跑。因職務上的關係，在這一時期內認識了很多政治家和革命家。後來爲一件小小的誤會——反對浙江廢督裁兵和自制省憲法，實行變相獨立的事，幾乎給浙江督辦盧永祥抓去。通緝我的公文，已經帶在特派來滬拘捕的金副官長身邊，經杭辛齋先生的全力担保，才算保全了一條性命。因爲這場風波，社中似乎對於我不很滿意，怕我還會發生與通信社關係方面有所不利的勾當。其實要做政治方面的新聞記者，有時對於政治認識不免會有不同的見解！何況那時在軍閥統治下的浙江，看他這種「別有企圖」的裁兵廢督的欺騙手段，身爲浙江老百姓，難免要說幾句公道話。話說得不當心，既有生命的危險，又與所屬的機關宗旨不相符合，這碗飯當然不會長久容許你捧下去的，毋許等候社長給你「另請高就」的通知信，我已經到杭州籌辦「西湖晚報」去了。

十八　商報館五年間

因朋友們有自己辦一份理想小型報的興趣，同到杭州籌備「西湖晚報」。在內地辦報，要先向警察廳登記，得到批准，才可出版。我們那時都不懂這手續的麻煩，冒冒失失的跑到杭州，租好房子，裝好機器，一切都準備舒齊了，左等右等，批示還是石沉大海，杳無消息。

這時的廳長是夏超，他有做省長的企圖。不曉得是誰替我們放了把野火，說這

報紙的後台老闆是曾經做過浙江巡按使的屈映光。

「他爲什麽要來杭州辦報呢？」也許是想捲土重來，復任省長。這把野火放得不大不小，經「候補省長」的心頭一疑，我們朋友們千辛萬苦籌集得來的二三千元資本，就在這一疑之下，化爲烏有了；三四月的籌備工作，四五個朋友的一片高興，都給「野火」燒得精光了。

報辦不成，仍回到上海來。這時恰巧上海商報館因席上珍自縊案的牽累，由湯節之讓渡給李徵五。有李先生的關係，得踏進商報館，在書記長陳屺懷先生之下，担任交際書記的職務。總管理處有西文書記李祖範先生，中文書記何璇卿先生，再加上一位交際書記，未免有點特殊。所謂「交際」工作，原來是代表報館吃官司的。辦報紙，尤其是在次殖民地的租界裏辦報紙，隨時有吃官司的可能。這不屬於編輯部又不屬於營業部的特殊工作，却落在我這交際書記的身上。「公堂」不必天天上，官司不是天天有得吃的，所以我的交際工作倒很空閑。

商報的主筆是陳布雷先生，電訊編輯是潘公展先生，本埠新聞編輯是朱宗良先生。經過一年「交際」之後，我才進入編輯部担任本埠新聞的編輯任務。這時，報館的經濟已相當困難，除固定的編輯人員外，沒有採訪新聞的外勤記者。無論出了怎樣重大的事件，除採用各通信社新聞稿之外，並無專訪。（資本較大的報館那時也沒有設立採訪部。）所以各大報的本埠版，大致相同，無法使牠特殊，更無法與別報競爭，編得出色一點。倒不及電訊版，有自己不同樣的專訪電，可以編到與衆不同的新花樣。在這樣環境下，我們（同朱宗良先生）都感到痛苦，又不爲上級人員所原諒！

對於報，我雖然有很大的興趣，但對於這毫無辦法的商報本埠版，整整幹了四年沒有一些成績，自己明白。

雖然一無建樹，但「五卅」慘案發生後，我們的本埠版也會得到讀者和同業間的贊許。牠打破過去畏首畏尾的因襲排法，將全部有聯帶關係的新聞，都集中在第一

版裏，標着極顯明有煽動性的大小標題，字裏行間，宣傳市民們一致起來反抗「文明紳士」的野蠻行爲。這是値得稱贊的，朱先生的「心血」！

商報，這奇特的新聞紙！

顧名思義，這張報紙是給商界閱讀的東西。可是事實上，恰恰相反，他是商界中人挺不喜歡的一種報紙。雖是報上另闢有一欄很有價値的商業金融，然而這特色並不能幫助這張報紙在商界中銷行；相反地，畏壘先生的評論，公展先生的國際一週却拉牢了不少知識份子的讀者。

除評論外，新聞方面限於經濟，是不能表示特色的。尤其是副刊的「商餘」，從張丹斧王鈍根以至於我的朋友陳小蝶，都沒有將牠弄好過。

李先生去天津後，北伐業經出動，那時的後台老闆傅筱庵，委請方椒伯先生繼任經理時，我就離開了報館，且離開了上海。

爲了公展的一則電訊「孫傳芳徘徊歧途」的標題，引起一場大大的風波。布雷公

展都相繼脫離關係。商報的精神喪失了，不久就關了門。

從十五歲時離開溫和的家庭，唯一的母校，踏進社會，到二十八歲的十三年間，掉換過不少的職業和服務處所，從沒有做滿到三年以上的時間。二十八歲起進入商報館到那時離開，計算起來倒足足幹了五個年頭了。在我全部的生活史裏，佔着相當重要的一頁。因生活的安定，家庭經濟，也比較舒適一點。

第二年夏季，我們——松泉，盧芳同我，合辦一家「乾彩」的光華書局——上海第一家純粹的新書店。

十九　光華書局的誕生

當倡辦西湖晚報的消息，告訴遠在新加坡的一位「候補華僑」沈松泉時，他非常高興他的朋友有了自己的新事業。不等我的召請，就向三友社辭職趕回祖國。不料他不爭氣的朋友「自己弄一張報紙幹幹」這小小的企圖又告失敗了。

怕又要失業了，不得已再進泰東編譯所工作。這時候泰東編譯所已經風流雲散，徒有其名而已。沫若仍在上海，却另住環龍路上，與泰東圖書局沒有什麼關

係。創造社同人的新作品，也有二年多沒有見面。

到民國十三年，「五卅」慘案後，我們幫汪北平先生在太和坊辦一張海員工報，松泉有時也來相幫發稿。這時，盧芳先生也脫離友邦保險公司，我們三個人就常常會在一起。

一天晚上，松泉和盧芳同到商報館來看我，說他們有個新計劃，要我參加。

「幹什麼呢？」我說。

「辦一個出版部，慢慢地將牠擴大成為新書店。」

說到書，對於我是頂感興趣的事，就在這一晚上，我們到海員工報社裏，共同商決一個初步辦法。辦法是很簡單的，因為大家都沒有錢，祇好各人盡各人可能担任的工作。——我是對於印刷所有相當交情的，同時也吃過紙行飯，就歸我向紙行賒欠紙張，同印刷所辦到不付錢可以先印出來書的交情。盧芳担任營業上和事務上的奔走。松泉担任拉攏撰部暫時不付現金的稿子。

如果都能順利地辦到的話，我們就不需要多量的資本。三個人祇拿出來二十五元錢作爲必需的籌備費用，——文具箋封招牌等。

二十五元，就是光華書局開辦時僅有的資本。（後來從太和坊出版部搬到四馬路市房時，又由我半捐半募地弄到二千多元資本。）

光華書局的創立，我們要感謝郭沫若先生的熱忱協助。就是他說的我們同在泰東編譯所裏有過半年以上吃大鍋飯的交情，願意將新著的「三個叛逆的女性」，和在許多刊物上發表過編纂起來的「文藝論集」交給光華印行。同時，更以最低的條件——五十元一期編稿費，編輯一種半政論半文藝的雜誌「洪水」半月刊。

創造社的刊物從「創造周報」後沒有另外出版過；創造社同人的新作品，也整整有兩年不曾出版過。

洪水，這有特殊風味的刊物（創造社同人除文藝作品外，從來沒有做過政治論文的），在讀者們迫切需要下，在一家陌生的書店裏出現了，很快的被各地同業所

重視，向來沒有交往過，也沒有先舖一層「賬底」，居然有很好的成績。貨款也有很多都是先期匯來的。

也因爲借住朋友的房子，不便長久下去；也因爲營業有發展的希望，想早點擬到四馬路的門面房子去。剛巧有一家招牌完全相同的小藥房出租，就租了下來，陰錯陽錯，別人以爲是書店裏帶賣藥品，也有以爲是藥房裏兼售新書，門市的生意，倒並不冷落。

我們可以自傲的是：在光華以前，上海還沒有純粹的新書店——牠是第一家。四馬路上也不是書店的匯集地段，牠又是「偶然碰巧」的第一家。看看現在四馬路居然成爲上海著名的文化街，想到那時候，祇有孤另另的一家破舊市房，難得跑過幾個買書的朋友，眞不勝今昔之感！

因爲這是大家都曉得的一家「乾兒」的小書店，創辦的又是三個在書舖子裏時常跑進跑出的巡閱使，所以格外容易得到朋友們義務的幫助。（那時就是我們所謂老

們每一個人也祇拿十元八元一月的車費沒有薪水的）邱韻鐸先生替我們看校樣，葉靈鳳先生替我們畫廣告，都爲着有相同的興趣。

周全平先生從東北墾荒回來，同日如先生在西門開一家咖啡書店，同時附設一個書報介紹社，編印一本新書目錄，專替內地讀者代辦並推薦新書。他自己做的一部長篇創作，也交光華出版，書裏更有很多靈鳳畫的帶着琵亞詞侶作風的插圖。

此後不久，就由全平爲主幹，計劃招股，創辦在文化運動史上有名的創造社出版部。

股份是向從讀者方面募集，也有一部分是外埠的販賣同行，所以定得很低。五元爲一零股，五十元爲一整股。有五元錢就可以做股東了，凡是股東，都有八折買書的優待。限額不大，很容易募集，大約募到一千五百元，就租定寶山路一幢小洋房，出版了許多四十開本的小叢書。

正在創造社出版部將要成立的時候，沫若應廣州中山大學之聘，同達夫獨清等

到廣州去了。創造社出版部的一切事務都交給全平，靈鳳，漢年三個人主持，稱爲「創造社小夥計」。

（註九）見創造十年續編一八五頁。

二十　小夥計們與幻洲社

「小夥計」們在大集團——創造社出版部——之外，另有小組織，叫「幻洲社」。以靈鳳全平爲主編，委託光華書局替他們印行幻洲社小叢書，一式的三十六開本，毛邊而橫排，經靈鳳的設計，裝幀格式都非常美麗。這「小組織」的收入，是供給小夥計們自己的費用，和出版部無關。

除幻洲社叢書外，另由靈鳳漢年合編一種「幻洲」半月刊，四十開的袖珍本，在

中國人向來喜歡「大」的特性下，看到它是會有一種嬌小玲瓏的美感。內容分做上下兩部，上部文藝版，剛夠登一篇短篇小說幾篇小品文，歸靈鳳主編；下部十字街頭，刊載短小精悍的評論隨筆，歸漢年主編。他們二人很要好，原來都住在創造社出版部內，後來一同另外租住在霞飛路上一家東洋人開的皮靴店樓上，布置得十分精緻，名爲「聽車樓」。

爲了「幻洲」裏一篇隨筆，我第一回嘗到「書店官司」。

在公共租界裏幹着文化事業，隨時有觸犯「奴隸法律」的可能。久了，「吃官司」變成書店經理們的家常便飯了。

自己雖然在上海社會裏混了十幾年，也曾替商報館担任過專吃官司的交際書記的特殊職務，然而對於書店，還是第一遭。官司要不吃，也儘多辦法，只要看你的手腕如何。可是我似乎不懂得這手腕的施用方法。這技巧並不因曾經混過十幾年而有所增進。所以總是一味的硬幹，想從硬幹去探求明明曉得決不會有的「公理」。

還是用妨礙風化罪提起訴訟。刑庭審判官是國內著名法學專家吳經熊先生。因為他也是一位愛好文藝的讀者，他讀過這類刊物和書籍。

「這是文藝作品裏很習見的描寫詞句呀！」他很嚴肅的反問檢舉的原告代理人捕房律師。

「…………………」

「並非誨淫，沒有什麼妨礙！」

在他的賢明的審判之下，並不處罰，也沒有將刊物沒收。雖然這次是我們勝利了，可是勝利屬於你，麻煩也就會使你更多，多得你一定要放棄你所探求的理想的「公理」，仍得施用手腕，待他們感到一定限度的滿意的時候為止。

為着硬幹，為着保障勝利，我們以巨大代價聘請一位英籍律師阿樂滿為法律顧問。（這時候中國律師還不能出庭。）不料在短短的六個月中，我們被控訴的刑事案件，竟多到七次；每一次又不能當堂了結，常常要拖到好幾庭，每一庭的距離又要

隔一星期。這樣，七次刑訴案件，從開審到判決，差不多平均每一個星期要上一回「公堂」（會審公廨）。

判決都是處罰金的，很有趣，他們用的是累進法：例如你第一回處罰的數目是十元，第二次就得罰你二十元，第三次，當然是四十元了。——不論你所犯的「妨礙風化」的程度，這一次是否比上次嚴重，或是無所謂。七次中，最高的紀錄處罰到一百六十元。

在租界協定未簽訂以前的會審公廨，真有些兒滑稽；如果隨時跑去旁聽，常常會使你發出會心的微笑。——假使想替「論語」找點幽默題材的話。

麻煩會使你工作停滯，患着所謂「歇斯迭里」症的。「公理」在這裏是找尋不到的了，手腕還得施用一下。爲避免不必有的麻煩，爲想增進你的工作，或者要做些比「妨礙風化」還要嚴重些的營業的話，在施用之後，（當然要辦到最低限度的滿意）也就可以「百無禁忌」了。

我記得有一次爲郭沫若先生的一本「水平綫下」後部裏有一篇「盲腸炎」的論文，我曾經「自願」一次孝敬過三百元大洋．平均計算起來，差不多每千字要化上八十多元錢，好貴的稿費呀！

廿一 迴光返照與黃金時代

民十二三年間，新書的銷行，才漸漸抬起頭來了；同時「禮拜六派」的勢力，也到達「迴光返照」一時期，全國的讀者很顯明地分成兩個壁壘。

其時創造社同人已與泰東圖書局分離。文學研究會却由沈雁冰先生在惲鐵樵之後，接編「小說月報」，改爲新文藝刊物；更在商務印書館館編譯所擴展計劃，和共學社一起努力著譯各式各樣的叢書。接着楊賢江先生接編「學生」雜誌，章錫琛先生

接編「婦女」雜誌，這是商務印書館走向新的方面最活躍的時代。中華書局則由張東蓀先生主編的「解放與改造」之後，也大量印行社會科學叢書。謹愼獨步的亞東圖書館，仍在胡適之先生協助之下，埋頭於中國通俗舊小說的考證和整理，造成鉛粒的「亞東版」。對這「亞東版」的謹勤工作，我們不能抹殺汪原放先生的苦幹精神！爲一部小說的校點費一年半載的時間，和十次八次重複的校對，是常有的事，這是「亞東版」之所以可貴，但也是被標點書商粗製濫造所打敗的致命傷。

除這三家書店以外，再也找不出一家新的書店了，也沒有一個新的出版社。

一直到十三年六月，光華書局才以嶄新的姿態出現於上海四馬路；十四年夏，北新書局從北平移植來滬；同時開明書店也由婦女問題研究會改組擴大而爲正式的書店。

被推爲新文藝書店老大哥的北新書局，十三年秋創始於北平李志雲老闆的住宅——翠花胡同，除販賣各地出版的新書刊物外，（那時武昌有一家書店曾刊行過幾

本黃鶴樓頭等新文藝書，但不久卽告消沉）自己編印十幾本民間故事小冊子。北京大學是新文化運動的發祥地，近水樓台，得到拉稿上許多便利。魯迅的中國小說史，小說舊聞抄等將續歸北新印行，聲譽日隆，營業也日見發展，遂於十四年夏將總店從北平搬到上海來。先在寶山里租下房子，隨後就開設發行所於四馬路麥家圈口豫豐泰酒館的樓下。（這地段還曾經開過一家張競生先生提倡美的人生觀的美的書店。）

開明書店的前身是婦女問題研究會。十四年間，章錫琛脫離了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就在自己的住宅寶山里內繼續刊行「新女性」月刊，同時也另印幾本婦女問題叢書。當時是沒有發行所的，新女性的發行歸光華書局代理，直到正式用開明書店牌號在望平街上開張之時爲止。

「迴光返照」期的「禮拜六派」，在出版物的勢力上估計，確比脆弱的新書業爲宏大，無論雜誌和書籍的銷行，也比新文藝更爲廣遠。最佔優勢的，要推號稱三

大教科書業之一的世界書局。

民國十年，沈知方先生以大刀闊斧的雄略，撇開其手創的廣智書局，擴大而成世界書局。抓着社會的弱點，利用讀者的惰性與迷信心理，用滑稽的手腕，出版鬼谷仙子等神祕玄學書；更以「紅屋」爲號召，請有廣大的小市民層讀者的快活林編輯嚴獨鶴先生主編「紅」雜誌。向行將沒落的「禮拜六派」注射强心針，施用大幅的廣告術，造成一度「迴光返照」，苟延二三年的壽命。

「紅」雜誌確有它廣大的銷路。更從官僚軍閥高壓下因無力反抗而形成幻想的社會意識，大量出版以「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俠義行爲爲中心的江湖奇俠傳等；以祕密結社，刼富濟貧等行動爲主幹的會幫小說；以桃色糾紛的新聞事件，或帶有偵探小說意味的事實的和空想的許多許多小說書，倒也能夠號召某一時期的讀者，而獲得意外的收穫。

同時，大東書局由周瘦鵑先生重編「禮拜六派」雜誌作爲嘗試的「半月」開始，接

着刊行包天笑先生主編的「星期」，也各有相當的銷路。並出版以戀愛問題或感傷主義爲中心題材的紫羅蘭叢書。它的巧小玲瓏的樣兒，頗引起少男少女們的愛好。

這是結束「禮拜六派」運命的「迴光返照」時代的輪廓。

在民十五六年大革命高潮前後，這畸形發展的趨勢就有了極大的變化了，很快的和必然地被消滅下去了！

從民十四至民十六年的三年間，我們也可稱它爲新書業的黃金時代。

革命策源地——廣州，是唯一的銷書市場。上海，雖在孫傳芳李寶章等高壓之下。但是他們對於出版物是不在心上的。共產黨的機關刊物「嚮導」和「中國青年」，一樣地平安在上海流行着，其他的文藝讀物當然更不成問題了。三民主義，建國大綱，共產主義ＡＢＣ和其他關於社會運動國際運動等新書，非常暢銷。——漆樹芬先生的一部二十萬言的「經濟侵略下的中國」是那時挺風行的一部名著。

黃金時代裏第一個發見它因而賺到大量黃金的，是張秉文先生，——一位別有

作風的出版商。他擁有太平洋印刷公司，就費了幾個月的時間精力，編印一部中山叢書，印成後就自己帶到廣州去，——這是廣州每一個民衆都需要的一種糧食。更跟着國民革命軍北伐的進展，在湖南，江西，漢口，各重要都市傾銷這部巨著；祇就這一部書而論，少說些也賺上十萬八萬元大洋了。

走着同樣路線，也獲得一批大財的是大中書局的老闆黃長源先生。此外，上海的新書店，舊書店，凡是能夠弄得到印刷機器的，無論誰，都馬上可以發財；同樣，印刷所的老闆們也可以靠此發了財；因爲這些書都沒有版權的，書店可以印出來發賣，印刷所裏也可以印出來發賣。而且祇要你有法子印出來，不怕沒有銷路。

革命軍佔領武漢時，長江書店就在上海裝了幾十箱新書在後城馬路開張，僅僅三天時間就關上鐵門。——所有的新書賣得精光。

這以前，除商務，中華，亞東外，上海的新書事業眞是貧弱得可憐，新書的產量固然很少，就是每一種的印量也非常的少。可以銷行的，一版印上二三千本，普

通五百本一版一千本一版也很多，到那時候，廣州，漢口二處同行的添書單子，已改爲電報了，一添就是每種三千五千本。銷路是有着落了，但是那一家有這麽多存書呢？沒有，就得再印，然而，每一家印刷所裏的印刷機器上，全張的，對開的，甚至于四開的都在一批又一批的印着三民主義或中山全書，那有空餘時間來印你的短版生意呢！所以雖在這樣滿地滾着銀子的黃金時代，而實際上賺得黃金的是有印刷所的或與印刷所有密切關係的新興書店(？)，並不是眞正已經開在那裏了的新書店。不過話得說囘來了，無論如何，在這時期中多少都沾光些便宜，有門市發行所的，買書的主顧確實增多了，就是向來對於新書不感興味的工商界也要爲明瞭三民主義或共產主義而讀書了。就使過去不易銷去的新書，這時候也連帶的比較平時多銷去幾本了。狂熱的情形到十六年淸黨運動以後才一落千丈；此後的新書業，眞度着艱苦困頓的日子，那種痛苦（精神的和物質的），恐怕祇有在這時期中的出版家才眞正嘗到。直到「八一三」抗戰發動後，再度抬起頭來。

廿二　北伐前後

民國十三年，中國國民黨改組。

十四年，上海市黨部左右兩派發生磨擦，終至分裂。一部分執行委員惲代英，沈雁冰，張廷灝諸先生退出環龍路四十四號，另在貝勒路永裕里八十一二號成立上海市黨部。那時在孫傳芳「剿赤」的高壓之下，革命的工作，都是祕密進行，開會商討總須在夜深時分。

不久，惲先生等都到廣州去了。市黨部補選我爲執行委員。

這「頭銜」怎麼會落在我的頭上呢？那是「五卅」慘案以後的事情。

「五卅」的傍晚，南京路上躺着十幾位參加示威遊行而被西捕頭愛活遜開槍打死的烈士屍身；總商會裏擁滿了工商學界的代表，一致要求全市舉行罷市罷工罷課的反抗運動。商會會長傅筱庵先生本是從不到會，而長期由副會長方椒伯先生代理的。方先生是有名的胆小的好好先生，這樣重大的要求，他沒有勇氣答應下來。相持不下，到晚上九十點鐘，形勢就愈益嚴重了。

當時我們所領導的上海各路商界聯合會有很多代表也在商會裏，就馬上在議事廳裏召集一次臨時緊急代表會議，一致地通過這個總罷市的議案。各路商界聯合代表的是小市民階級，它以商店爲基礎的，倘使各馬路上的商店全體拉攏鐵門，罷市的形式已經形成，商會的允許參加與否，其效果就等于零了。于是，在我們散會之後，牠(商會)也共同具了名，連夜發表通告。

「五卅」運動的黨員與青年們的實際行動指導者是林鈞先生，從那晚起我們時時在一起做工作，就介紹我加入國民黨。雖然是執行委員，在黨部裏却沒有實際的工作，仍舊繼續商民運動一方面。——「五卅」週年紀念示威運動的傳單都預藏在光華書局內，由市黨部祕密通知各團體各區分部假裝買書的顧客，偷偷地一包一包挾了出去，居然混過近在咫尺的巡捕房偵探們的耳目，順利地在南京路上散放。

北伐將出動前，上海各路商界聯合會裏還是分成贊成和反對兩派，暗鬥很烈。反對派以鄔先生爲主腦，他是資產階級的代表人，有雄厚的潛勢力；他們用「君子不黨」的口號爲號召，于是一知半解的舊商人都附和他；同時，淞滬護軍使李寶章又用高壓手段對待革命黨員，凡是同情革命的都加上一頂「赤化」的帽子，腦袋就有掛上電線桿上的危險。在這樣環境之下，孤軍奮鬥是不易成功的，要從事實際的鬥爭，爭取各路的會員商店，不能不組織「黨團」。所謂「十三太保團」就應這需要而產生。

一部上海商民運動史，「十三太保團」的領導工作是佔着很重要的一頁。——北伐的響應，公共租界工部局參政權的爭取，抗捐運動的擴展直到華人納稅會的成立，都有過英勇鬥爭的史實。

所謂十三太保，就是十三條馬路的商民領導人的「黨團」結合，為同一目標，同一信仰而奮鬥，以一致的步伐向前邁進。牠的結合是採取封建的形式，用「桃園結義」的舊方式，拜為盟兄弟。——余華龍，嚴諤聲，王延松，陳翊廷，鄭頌三，張振遠，蔣信昭，陸文韶，吳亮生，許雲輝，虞仲咸，沈承甫和我。

那時，市黨部準備辦一種國民日報，作為宣傳機關，已經中央宣傳部核准，撥給開辦費，派張廷灝先生回滬籌備。這有「赤色」嫌疑的日報在公共出版是不會有希望的，就租下愛多亞路靠法租界方面的房屋作為社址。法租界曾頒行過取締印刷品條例，凡在租界內無論出版或經售任何印刷品，都得經法工部局同意或領事署批准。（這條例現在還存在）國民日報的籌備工作已大體就緒，經理由張先生担任，

總主筆是柳亞子先生，總編輯沈雁冰先生，請我担任編輯本埠新聞同一份屬于本埠版的附刊——本地風光。臨到出版日，批准的命令還是沒有下來，報紙就在娘肚子裏宣告了死訊。

因爲報紙沒有出世，所以同事們多不曾會面過。就以沈雁冰先生來說吧，我們是上海市黨部的先後任執行委員，又同是國民日報的編輯人員（十六年在上海出版的國民日報是另一回事），更同在上海長時間幹着「異途同歸」的文化工作，竟會沒有會見過。一直到去年抗戰後在漢口大同旅館見到時，提起十四年前的舊同事關係，都未免有點好笑！

十五年冬，總司令部駐在南昌，我和松泉同到南昌去觀光。後來又開辦一處光華書局的南昌分店。

新文化運動雖有七年的歷史了，這樣重要的省會似乎都還沒有被普及到。我們到達南昌之後，在許多新式的舊式的書店裏居然找不出一本「新」的書籍和雜誌，因

而感覺到推動文化的工作，還正有待于努力。光華分店的創設是有相當意義的。

這一回，我住在南昌有好幾個月，在南昌大旅社長期包定一間小房間，凡是上海來的朋友，很多住過我的小包房的。除兼管書店事務外，還承陳布雷先生的介紹在江西財政委員會派駐市汊(離南昌八十里)統稅局的監察委員。

監察(?)工作是不會有成績的，事實上貪污橫行，賄賂公然也決不會容許你做出理想的或可能實現的成績的。——我曾經寫過一本小冊子「革命後的江西財政」。

革命軍克復京滬後，急忙又回到上海。

在南昌時葉楚傖先生要我回到上海進民國日報，後來又經陳德徵先生的函催。不料到達上海，局勢完全改觀，德徵已充任市黨部宣傳部長了，就聘任我為國民通信社的社長，每個月可以拿到四百元的津貼。

政局老是不穩定，這工作，也做不得不久，仍回到自己的「老米飯碗」——光華書局。

廿三　從「現代」到「聯合」

我自己是文藝的愛好者，松泉也有同樣的嗜好。當然囉！在我們主持下的光華書局，不免偏重于文藝書籍。然而在大革命時代，社會科學書的需要超過文藝書。正在這時候，我的同鄉朋友洪雪帆先生，剛從宜昌內地稅局卸了科長任回來。他正愁着裝滿了大皮箱的鈔票沒有用處，來和我商量。

其時我又剛接到財政部的新委任爲上實化粧品印花特稅專局局長任命。如果我

是精于稅收的官吏，這件事是公認的一塊「肥肉」；如果我是長於理財的專家，這也是一樁「取不傷廉」的奢侈新稅，可替國家多打開一項財源。恰恰相反，我是完全外行！三個月的江西省統稅監察委員的工作成績，僅僅是一本「革命後的江西財政」，隔靴抓癢的紙上兵法。大家認爲這不過是文人不懂捐稅情形，能說不能行的一張「牢騷」計劃書罷了，財政部通知全國的訓令已發出去了，而我呢，還捧着這一紙委任狀在那裏想不出「從何下手」的「頭路」。他來得正好，我就對雪帆說：

「你是辦過稅收的專家，這工作還是你來幹一下吧！」

「我不想再吃這碗飯了：我想要換換口味。」

「那末找到我，祇會辦一張報，或辦一家書店吧！」

「好！……我們還是再來辦一家書店吧！」

就在這簡短的談話中，「現代書局」的招牌，第二天就在商報館的二樓上掛了起來；那個上寶特稅局長委任狀，祇好原璧歸趙。

現代的資本是五千元，由他出一千元，我同松泉出八百元，其餘的都向朋友們半募半捐式弄來的。職務的分配：他是總經理，我是經理，松泉是出版主任。

經驗告訴我，合作的事業，總是不容易維持久長的。集合開始愈便利，離散時間愈短促。這是過不慣集團生活，不肯犧牲小我，缺乏自我批判精神的結果。不能相互地瞭解，就不免發生磨擦。磨擦會喪失理智。

我不能說誰是誰非！不過正當現代書局發行所租定了四馬路嶺南樓下面的市房時，我們已經「各自西東」了。

接着，盧芳進了現代。又不久，我們十年間長相隨伴的老朋友——松泉，也和我瓜分這正在發育期的光華書局了。雖然我們二人的分手，並沒有鬧過一次不可調解的意見。小小的磨擦，當然是難免的。

我當時要再辦一家現代書局的用意，是想將光華仍保持已經走了四五年的文藝路線，而將現代書局成爲純粹的社會科學書店。分裂之後，這計畫當然無從實現，

然而我念念不忘的純粹社會科學書店計畫的嘗試，還是沒有消逝。

走出了現代。走出了光華。很快就另起爐灶來獨創一家社會科學書店——上海聯合書店。

試試看，寫了一封信託李一氓先生轉給住在千葉市的佐藤和夫——沫若，問他有沒有社會科學的譯稿。這全是試試看，明白曉得他是弄文藝的，尤其在日本帝國主義者偵探們監視之下，卽使有這樣的心意，也不會有現成的稿件。何况社會科學稿，在國內有沒有書店敢接受來出版，還是很成問題。——當時商務印書館連郭譯的河上肇氏「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已宣告絕版；就連毫無關係的譯作屠格涅夫氏的「新時代」也收藏起來了；棠棣之花等舊作重編的「塔」，也無處可買了。

出乎意外的，居然告訴我，他正趕寫一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已將完成，可以交給我出版。——並且聲明，這是他比較滿意的一部著作物。這樣一來，專門社會科學書店的上海聯合書店就在四馬路中西藥房隔壁大廈上豎起了招牌。

雖然發行所是在二層樓上，但門市營業倒並不冷落。可惜的是當時對于新興社會科學書，無論是著作的，或譯述的，都有使讀者看不懂的「奧妙」。——後來大家公上一個名號（對那時候各書店所出版的社會科學哲學書）叫做「天書」。

查禁書籍的法令，在當時並不十分嚴厲。文藝作家們正在大談其普羅文藝。姚蓬子主編的「萌芽」，蔣光慈主編的「拓荒者」，魯迅主編的「奔流」，郁達夫主編的「大衆文藝」等雜誌都有廣大的讀者羣。

到了民國十九年的秋季，僅僅我們聯合書店一家，就收到了有十七種社會科學書查禁的訓令。

只有一年歷史的小書店，總共出版不到三十幾種新書，內中還有一部分是新聞學一類的冷門貨。一次就查禁十七種，變成爲好銷的書沒有了，剩下來的都是不能銷出去的冷門貨。日常開支是省不下的，雖然樓上的一角，房租也就要八十元。這樣，無論如何不能維持下去的。想來想去總想不出較好的辦法，五千元資本已變做

一半是包花生米的有字紙，一半是餵老蟲的食糧。如果要重整旗鼓，除非是另加資本。然而還有誰肯做這渺茫的投資呢？結果，還是搬到里弄裏去同老蟲分嘗這高擱在木架上的殘糧罷。

爲了一家人的生活，我不能不再度離開我興趣所屬的出版事業，應湖北省主席何雪竹先生之召，到漢口來担任整理湖北中山日報的工作。

「這是美缺呀！」一大家都這樣向我道賀。但是我究竟是個「傻瓜」（當時朋友們這樣嘲笑我）我竟然沒有發見牠的「美在那裏」？

六個月的整理成績，換得何先生一聲口頭的贊許。——「調了五個主任，祇有你的成績辦得頂好！」

大水災之前，又重復囘歸上海。

× × × ×

順便談一談郭沫若先生的「我的幼年」被禁的故事：

有一天，一位「文友」來見我，談了一套閒話之後，他告訴我，他已走進教育局担任審查書籍的工作。

「那很好呀！」我說，「將來可以託你轉達轉達我們的痛苦。」

「我的幼年怕要查禁了！」他突然向我提起這一本剛出版不久的新書。

「別說笑話，這本書有什麽可禁呢？在你賢明的審查之下。」

他笑笑走了。

第二天，他又來找我：

「我有一部新稿子，要給你出版。」他從公文包裏拿出一大堆原稿紙來放在寫字枱上。「抽版稅，但要先預支二百元。」

我略略翻動一下，就回絕了。原因很簡單，我的固執的偏見使我對情書一類的作品，感不到興趣。所以在我手裏，從不曾刊行過這一類新書。

兩天後，有一隻巨大的信封從外面遞進來，……「我的幼年」因內容反動，不

准發賣。……笑話變成爲事實，一本記述兒時生活的小說，也會加上「反動」的罪名。那時的教育局長是陳德徵，我自仗與他有深厚的友誼，就跑到民報館的編輯部去找他，請他指示禁止的理由；也許還可以删去或修正一下，一千多元的造本不至完全完結。我希望着。他很亢爽的囘說：

「這事件我不詳細，你還是將你的理由用呈文吧！」

于是我將樣書和呈文送到敎育局去。很快，得到了批示，說是書的後邊的跋文有二句：「革命已經成功，小民無處吃飯」，不是「反動」是什麼呢？

「這是可以删去的，何況又是跋文哩。」我再補上一個呈文。從此以後，永遠沒有了下文。

過後，現代書局以十五元一千字的代價向沫若賣了一本自傳的第二集「反正前後」出版了。如果說「我的幼年」要查禁，那麼這本書當然也不會逃免的。然而出乎意外的永遠無恙。再過些時，我的「文友」的厚厚一本「情書」，同時也躺在現

代書局的大玻璃柜窗裏了。我遇到雪帆時，劈頭就問到他：

「這部情書是你們買下的麽？」

「不！」他笑着說，「抽版稅，先預支二百元。」

聽說後來現代書局很靠這部「情書」賺了些錢，銷行三四版，定價也不低廉。有什麽可說呢？有眼不識泰山，還要「殃及池魚」！貽累了讀者們祇好先讀完這部自傳的第二集，將來再補讀這第一集了！

廿四　再度脫離現代

現代書局的發行所鐵門上交叉地貼上了法院的封條。

盧芳（現代的經理）登報聲明脫離現代書局一切關係。

經過雪帆的奔走疏通，結果，得到某方面的諒解，在推薦一位編輯主任的條件之下，重新拉開牠的鐵門。

自從十六七年以後，新書事業，已經是十分悽慘，每一家新書店都在艱苦掙扎

之下苟延殘喘。現代也不能例外。不幸再經過這度風波，經濟狀況眞臨到「山窮水盡」的境地，時時有倒坍的可能。

「條件」的限定還要書店裏印行二種××文藝的雜誌。「現代文學評論」，和「前鋒」。而于新書方面，爲了這也有好幾個月不出版了。書店的營業，同別的「行業」有些異樣，書店是沒有「老牌」和「新牌」之分，老實說，不進就是退。任你有幾十年的歷史，任你歷史裏有過光輝燦爛的史蹟，不繼續跟着時代的輪子前進，就會被時代所淘汰，被讀者所遺忘。這時候的現代，限于經濟能力，限于「條件」，已經漸漸地同時代脫離了，距離愈久而愈遠了！

我回到上海，住在中國飯店。當天，雪帆就懷着滿腔抑鬱來盡情地向我傾訴。

他劈頭第一句話：

「你是現代書局的父親，我是牠的母親，盧芳是牠的奶媽。」他很沉痛的說道「現代書局到了今天這樣危急存亡的關頭，你不能說一點沒有罪過！」

「……」我被他的話打動了。他接着說：

「我們是朋友，又是同鄉，你我一生的境遇大致是相同的，我的事業就是你的事業。」

是的，我憶起了「父歸」，我責備過這劇本裏的主人公。對于這曾灑過我的心血的現代書局，要救牠蘇活起來，健全起來，祇要我肯犧牲我的一切，將全部精力供獻給牠。經過五日夜誠摯的談話結果，我們又重新合作了。

當時，我提出三個基本條件：——

內部的業務，完全由我主持，使我可以放手做去。

公司的事業不能視爲私人產業，擴大股份，成立正式有限公司。

用人以人才爲主，職員的進退，須經過二人事前的同意。

他完全答應了。在停頓中的上海聯合書店，全部客賬，存書，紙型，版權，生財等等一切以一萬元的代價歸併給現代書局，以五千元作爲股份，以五千元料理聯

合名下的未了債務。這理想的社會科學書店，到此宣告「壽終正寢」。

踏進現代，各部分的現狀，距離我的想像眞太差了。就連普通商店裏的一切起碼條件都不具備，每天讀到幾十封讀者寄來的責罵的信，各式各樣離奇的話都有聽到。貨棧裏堆滿着滿房子不能銷去而封面還是嶄新的過期雜誌和新書。一切都無從下手，經濟的窘迫又使你無從提出什麼大小革新的計畫。

唯一先決條件，要從招募股款入手。——有了錢，才有辦法。

接着「一二八」淞滬戰事發動了。

戰事發動前半月，我因應徐朗西先生之召，同到漢口去。去的目的，一則因岳維峻師長死了，遺下全部的關中健兒需要有資望的人加以統率和安慰。徐先生是很適合這條件的，就要我一起去辦理祕書的事務。一則因現代書局雖準備改爲股份有限公司，擴大招股，但在上海市場上，有錢的資本家寧願做交易所買賣而挺不高興辦文化事業」想招股非常困難，換句話說，等於向他們借債，也等於捐款，給你就

完了，以後不相問聞，（現代許多股東就是這樣的）要爽爽快快招募多一點，還是向軍政界要人們進行。我既加入合作，徐先生本來預備替聯合書店招募的幾條門路，就留給現代了。事實上，因我們是近二十年的忘年交，所以必需要我同他一起去，才有辦法。

我們回到上海，已經是淞滬戰爭後十餘天。一切商店都關着門，現代也同樣關着門。半個月後因讀者在火藥氣氛中迫切需要精神糧食的調劑，書店——這文化的雜糧舖，老關着門，到底沒有什麼意義；何況也多多少少可以做些生意，解決不曾逃難回去的店員們的膳食費用，我們主張先行開門。

第一天，不料門市收入竟達到三百五六十元，打破現代門市收入的紀錄。從一批進一批出的讀者們的需要看來，戰事照片複製的畫報，最受到歡迎。於是，葉靈鳳先生以出版部主任資格就自己動手來編製一本「淞滬戰影」。

淞滬協定成立後，第一位大書店商務印書館，因閘北總廠被敵機炸燬，東方圖

書館也遭了殃，更因工友職員的去留問題，發生嚴重糾紛，整個的事業，都停頓下來了。（註九）

商務以教科書爲主要營業，教科書的銷數和產量，都有相當的統計，平時各書店教科書方面的營業，並不是有特關的新路線，而是同在一個圈子裏面互相競爭；說得明白些，就是在已經爲商務所控制下的生意，大家以各自的智慧和手腕去分些過來，有的以質的改進，內容充實，印刷精美來爭取讀者（學校教師與學生們）；有的以編著方便，工料減低，佣佣優厚來爭取顧主（學校職員與各地販賣同行）。

現在這握着全國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教科書營業的商務既自動停頓，正是其他的教科書同業推廣自己出版物的唯一難得機會；而且事實上，也因商務的停頓，各種應用讀本供不應求，營業也自然而然增高起來了。

商務的停頓，與新書店利害關係很少；新書店是以刊行新文藝書爲主要業務，而商務除曾於十二三四年間出版過文學研究會叢書等外，後來很久不注重於這條路

線（註十）。祇有一本有攸久歷史的「小說月報」，自有牠廣大的讀者羣。當然，這時期也同樣停止了。同時，上海方面也沒有比較像樣的文藝刊物。

「這是我們應該做的工作；在業務上着想，也應該立刻出版一種純文藝刊物。」

這一建議，很快就得到幹部同人的同意。於是由我寫信到松江，請施蟄存先生出來主編。——在這一時期，他是挺適宜的一位編輯。對無論那一方面都沒有仇隙，也不曾在文壇上對某一位作家發生過磨擦——同時更請他兼任公司的編輯主任。再辦創一所印刷廠，請盧芳担任廠長。——他有新光印刷公司失敗的經驗。請宋易担任推廣部工作。並將四馬路發行所擴大為四間兩幢，十分堂皇。

「現代」——純文藝月刊出版後，銷數竟達一萬四五千份，現代書局的聲譽也聯帶提高了。關于業務方面，在第一年內完成了初步發行網，設立各省市直接或間接的分支店。決定了出版路線，提高新書的「質」，增加新書的「量」。設計一個在資力可能範圍內的三年計畫。

實施的結果，成績倒很不壞，第一年度的營業總額從六萬五千元到十三萬元。這是同人們對于這初步計畫努力的收穫；也是我個人嘗試的成功。

同時在內部有一樁最大的改變，也是最有意義的成就。過去的現代，雖有有限公司之名，而實際是合資式的商號組織，一切權力，集中于總經理的一身，各部事務不論大小都時時要向總經理請示；有時更以個人的喜怒哀樂向職員面前發洩。所以不論才具，祇要會趨逢總經理的意趣的，就是好職員。從我踏進之後，以養成各部自動爲原則，盡量使各部同事發揮他的才幹，用人標準，論才具而不講「面子」，漸漸地使同事的對所管的職務負起責任來，對于所做的事情發生興趣了。（在五十五位同事中，祇有一個是我的外甥可以說是私人。）

在同事們共同努力之下，現代的信譽與營業日益隆盛。民國廿一二三年間，已是全中國唯一的文藝書店了，可以說。

爲掉換編輯主任，爲停止刊行二大刊物，我代人受過了。結果是：各方面對我

不滿，由不滿而誤會，由誤會而攻擊了。然而，我都沒有理會，我沒有向他們解釋。我曉得，有許多事情愈加解釋愈會引起誤會的。我之所以肯這樣做，是爲要報答「知己」，在當時我對于雪帆具有知己之感。所以，我肯犧牲我的一切爲事業健全而努力。我是個失去父母慈惠的孤兒；我是個失去兄弟友愛的孤雁；我需要一位瞭解我的「知己」，我需要偉大的友情的慰藉。

四十年流浪生涯，找到了歸宿；十五年事業興衰，得着了復蘇。

× × × × ×

民國廿三年十一月某日，在一個嚴寒的隆冬之夜，我奉了公司的命令，獨自個兒踏上遠征四川的富華輪船。

這一次的遠征，是要爲公司去整理八年來長江上游各地同業的客賬，公司爲調查和開闢一條新的發行路線，使公司的基礎更鞏固，前途更光明些。（成都書業公會同人告訴我，上海書業界中人到成都去的，還以我爲第一人，所以他們要爲我熱

烈地歡迎和歡送。）

枯水的川江，航行是相當危險的，小小的富華輪走了十四天才靠在朝天門外的嘉陵江邊。

民國廿三年十一月廿七日到達重慶，打了一個電報到上海公司，報告我的行旅平安，同時開始我應做的工作。

廿九日上海現代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召集一次臨時董事會議，在這屆會議席上，有一重要的議案：——

「本公司經理張靜廬辭職赴川，請予照准。」董事會的決議是「准予辭職」。（註十一）

除出席董事外，公司的同事中祗有一位總務課員兼任董事會書記的劉豈先生列席的。（他現在紹與任戰旗書店的經理）。

第二天，這位劉先生也因曾經列席記錄的關係，得到「免職」的命令。從此，

這件議決案再沒有局外人曉得了。一直「珍藏」到我從四川遠征回來，交清了賬目和款項之後。

我不相信人世間竟會有這樣的「陰謀」！沒有一絲血痕的一把利刃，從我認爲有「知己」之感的朋友，親手刺進我的心坎！

(註九)見東方雜誌王雲五先生的「兩年來的奮鬥」。

(註十)據一九三一年文藝年鑑(現代版)統計，該年商務只出過一本文藝書。

(註十一)爲停止　先生職務我寫信給報一封以去就力爭的信底提出來作爲我離職赴川的原信。

廿五　上海雜誌公司的建立

提起上海雜誌公司的建立，倒是一樁很有趣的故事。

當我等二次被踢出現代書局大門時，才發覺我的四周還布滿着天羅地網，使我永遠不會再有翻身的可能。這一次的教訓，在我的生命史上，永遠留下不會消失的創痕。

爲要維持公司的生存，祇得領取極少的生活費，但九口之家，這一些生活費是

萬萬不夠應付的，不得不另築債台。爲要專心一志的使公司業務發展，又不得不將僅有的一些些的事業根基，在合作條件之下消逝了。到此，已經一無所有，後悔也來不及了！但因受着過度的刺激，對人生感覺厭倦；甚至咒咀自己而要燬滅自己。

典賣僅有的一些衣物，獨自寄寓在一家豪華的旅舍裏，盡情地歡樂，過着變態的生活。正當這時，張振宇先生忽來找我，要請我担任他的時代圖書公司的華南五省總經理。——人在落魄時，小小的慰藉可以暖于春暘。

我答應了。

一切合同草約都經我們商擬妥善之後，不料另一位股東忽然提出反對。

他反對的理由，很有意義的——

「這傻馬不是我們所能控制的！」

是的，我雖沒有縛鷄的腕力，而却有舉鼎的雄心。老實說，在當時上海的同業中，值得我欽仰，或使我感到可愛的出版家，眞是寥寥無幾！

接着松泉要我重回光華，復任經理。那時盧芳也在光華幫忙，老朋友在一起可以更有興趣些。我又答應了。然而小小的光華決不是現代的敵手，因而我計劃在對面鄰近，再擴充一部門，以便擴展營業。正當這時候，羣衆圖書公司方東亮先生願意將他的門市讓租，我們租下了。租約及合同都由我代表出面簽訂。

爲避免業務上的衝突，準備將牠專營雜誌。因爲各業都在不景氣氛圍裏，書店也不能例外。書業的出路祇有學校用書，一折八扣標點書，雜誌三項倘可存在。學校用書是需要大資本的，標點書不願幹，剩下來的祇有雜誌。農村的破產，都市的凋敝，讀者的購買力薄弱得很，化買一本新書的錢，可以換到許多本自己所喜歡的雜誌、講到錢，雜誌這一項買賣，當然不是生意經，也許還要蝕本；但是爲事業前途的發展，爲文化運動的普及，雜誌倒是可爲而不可爲的出版事業。我們決定採取這條營業路線，取定上海雜誌公司的牌號——過去和現在，中國還沒有專營雜誌事業的書店。

一切都已舒齊了。松泉忽然感到這是太冒險的舉動。無論從那一方面推算，這公司——光華的支部——是把不穩的。當時光華的經濟已經十分困難，如果再加上一重負担，幹得一不順手，難免連這家老店也會牽累而倒坍的。他考慮了兩夜，決計不幹它，要我去回絕。在我呢，原是無可無不可的：四川的朋友周世恩劉葆甫二先生正要我離開上海，到重慶，成都去開兩家大規模販賣書店，資本由他們代爲籌策；同時，上海也有十六家新書同業，都希望我肯往四川去，無條件的給我全四川總特約。這眞是機會難逢，我想去，而沒有決定。爲什麼呢？說起來未免小氣吧，我想「報復」！我不願離開居住二十年的上海——四馬路。

不料，方先生怎樣說都不答應。事情弄得糟透，一方面不要幹，一方面又非叫你幹下去不可。結果，無可奈何，決定歸我自己出來硬幹。

在離開現代時，還有三千元股款可拿，倘然一次拿回來，也還可以解決一些必要的債務和重建事業的準備；可是不行，祗允許每個月拿回一百五十元，這一百五

十元，又恰恰抵過我的一家生活費。這樣，卽使你要想翻身，也是不可能。（這是後來另一位洪先生私下告訴我，也是給我許多毒箭中的一支；所以現在提到它，還覺得心驚肉跳哩！）

終于在沒有辦法之中，弄到一筆很少很少的創辦費，就冒險担當下來了。店員特別少，除掉我，只有一個我的老學生張步高，和我的姪兒鴻飛。三個人祇有一條心，不畏辛勞，不講報酬，實行埋頭苦幹，硬幹，實幹！

小小的計畫，逐步施行起來倒相當順利。精神上得着老朋友盧芳和唐性天先生的協助；不相識的很多很多朋友——讀者，似乎對于我，對于這初生的公司也有特別的好感，營業得以一天天興盛起來。內地各省市的同業與我個人都有相當的友誼，他們也給予我不少的協助和鼓勵。

廿三年五月一日，上海雜誌公司就是在這樣有趣的過程中建立起來了。這是比光華書局誕生時還要罕有的「奇蹟」——僅有的二十元創辦費！

廿六　小小計畫初步成功

出乎意外地——一帆風順！

上海雜誌公司到現在五年間，大體上可分爲三個階段：從初創到廿五年春爲販賣時期，雖然這期間也自己刊行過讀書生活半月刊和文藝畫報等，但仍以販賣爲主要業務。廿五年春譯　復刊起到廿六年夏，爲雜誌出版時期，這期間，以自己刊行雜誌爲主要業務，而以出版新書爲副業。從「八一三」抗戰發動到現在止，爲抗戰

宣傳時期，爲配合抗戰宣傳而編印戰時新書，以刊行雜誌爲輔助。

先來談談第一時期。

雖說是販賣，以很少的資金，很狹隘的門市，沒有號召能力的一家新開的小書店，要在有歷史，有地位，有雄厚資金的一羣新書店中間生長起來，眞是毫無把握；何况又有人替你布滿着天羅地網在你的四面八方！那麼當然需要有種新計畫，這計畫要配合着很少的資金，周轉偶感不靈，就會立刻倒坍下來的。

說來本來也是平凡得很，這小小計畫是屬於販賣的，實現：快，齊，廉三點。雜誌營業和書籍販賣有些不同，它含有時間性，失了時效就沒有人請敎了，可是如何能夠比別家快到，早一天拿出來賣給讀者，倒是煞費苦心的事。爲要達到這個目的，因之常常不恤虧本。商人口裏的虧本，本來不容易使人相信的，俗語說「千賣萬賣，虧本不賣」，你的所謂虧本，在聽的人也不過當你是「商人寶鑑」裏的一句術語而已。實在說來，我們却眞的在做虧本生意。舉一個例：那時本公司門市上出

賣雜誌新書，都是照實價打九折的。當良友圖書公司將這一期「良友」出版後三天之內，决不批發給同業的，除非是到他門市上去零買。零買要照實價計算，不折不扣。爲要快到，我們就不恤以實價四角一本，向他買來，立刻在公司櫃上賣給讀者，仍照向例九折收款，這樣做，賣去一本，虧本四分。這就是虧本的實例，但是「快」一到底實現了！

至於齊，那祇要你肯留心，不管它有人請致沒有。一本刊物的出版，無論如何專門性，總有它的讀者。比如關于天文學的雜誌，向來不爲書店所願售，因它是冷門貨，更因它銷得不廣，出版處將每期的印數限制了，不願多印，你要它，非期前約定，還得先付書款。這在從前是沒有一家書店肯幹的。現在我們爲要辦到齊備，當然顧不得損失與否，賣得了或賣不了。留心的搜集起來，也有四五種呢！

第三是廉。讀者購買力薄弱，沒有資力買新書，也很少有餘資多買雜誌，雖是雜誌比較書籍便宜。爲要減輕讀者的負担，公司方面用着兩天生意一天做的辦法：

譬如一天要做三十元生意的利潤，可以維持一天的開支，現在呢，我們用廉價的辦法，使它做到六十元來維持一天的開支。一而二，二而一，目的還是同樣的。普通商業上的口頭禪叫做「薄利多賣」。

這些都是販賣書店應注意的起碼條件，並不是難做到或做不到的。然而在那時候，大家似乎都不肯注意到。也許，上海書店都是靠出版的，販賣是無所爲的熱鬧門市吧了，所以便不在這上頭用工夫。我們則不同，既是完全靠販賣爲主要業務，不得不走着別人所不願走不曾走的崎嶇小路。

小小計畫的初步成功，眞出乎意料之外，一天的營業，——當然祇限這一間狹隘的門市——從十幾元收入增高到二百多元；第三個月統計達到九千六百元，比較任何有歷史有地位有號召力的書店相差無幾；有的更可以超過它。——專靠門市一部分零星賣買的話。

從五月一日開始到十月底，公司方面居然賺到幾千元錢，——這時候是純粹販

賣，當然以賺錢爲目的的，沒有錢，什麼計畫都談不上。因爲那時的我，眞是兩袖清風一無所有的一位被朋友拋棄了的窮光蛋呀！

有了幾千元錢，就決定要擴大我的事業，改進我的業務，再鑽進出版界的圈子裏去，實行我的「走曲線」的出版路線。于是再加上一位女朋友的協助，湊足額定的資本，正式呈請實業部註册，——上海雜誌股份無限公司。

負無限責任的股東，當然還是我。

廿七 「退定改定絕對自由」

我已說過，雜誌公司營業方法與一般書店的營業方法有點不同。

我們第一步的小小計劃已經收到成效，于是就着手實施第二步計劃：——代定代辦代理發行。這也是經營雜誌事業的主要業務。

代定，並不限定于自己發行的刊物。因爲你既然掛上雜誌公司的牌招，又廣事搜羅各種雜誌，陳列在一起，等于一個「雜誌市場」了。買小菜的到小菜場裏去不會

錢的，也可以節省許多時間和精力，買魚的不必到魚行去，買肉的不必上陸稿荐去了。因此，凡要買雜誌的讀者，不管買什麽雜誌總是跑到雜誌公司來；同樣，要訂定任何雜誌，也就全到雜誌公司裏來了。論服務是應該代勞的，論利益，雖祇百分之五的微利，也不能說沒有報酬。這樣，我們想要弄它像樣些，就特別舉辦一個代定部。訓練幾位十幾位熟練的店員，專門管理這一部份的事務。祇要它是定期刊物，祇要它還在繼續出版，我們都可以，也應該接受下來。有的很便利，接受後，出立我們自己負責的代定單交給讀者，隔天就將底下一份通知單送給原出版處，自己博得百分之十或百分之五的手續費。然而也有比較麻煩的，例如訂閱日期向例是全年或六個月，可是那個定戶(軍部等)以駐調無常，沒有有長期一定的地點，雖然可以更改地址，但行軍中連改寄也無從說起，那麽爲便利起見，還是向你定閱三四個月吧。既是服務社會，能說因格于成規而不接受嗎？還有一種是私人出版的，個人的變動較多，能出幾期算幾期，行蹤無定，社址甚多是私人的住家或附設的通訊

處所，這種預定，轉過去既怕落空，不接受又有悖讀者的好意，當然祇得接受後，改爲自己出一期寄一期了。更加困難的是週刊旬刊等，當一個定戶通知改寄地址的信到達公司的時候，他所定的雜誌早已寄出一份二份了，郵程參差，他是不會收到的，郵政局也不見得會件件都退回，於是乎誤會就要發生。定戶說我沒有收到是事實，公司說我已經寄出也是事實。定雜誌的人原是想聯續閱讀的，現在中間缺少一期，心裏比什麽都難過，你能說不補給他嗎？偏巧這一期又剛剛賣完無從買得，心急朋友就硬說你騙他，那會這麽巧連一本都沒有的事。這樣一來，豈不使讀者對于你的信仰發生動搖！能補的當然還是補給，不過一年裏只要發生一次，你的一年的代定酬勞就完全賠貼了，有的還要虧蝕。

我是個十足的讀者出身，讀者所嘗的痛苦我都明白。所以到我獨創一格，開辦上海雜誌公司時，竭力要克服種種困難，彌補種種遺憾。關于代定雜誌，第一注重點是保全定戶的「血本」。凡是他所定的雜誌中途不能繼續出版時，就立刻通知定

戶，請他來算還應找的餘款，決不使他受着絲毫損失。第二是讀者興趣改變或雜誌內容低落時，定戶既已訂定了一年或六個月，不曾滿期，雜誌還繼續出下去，論理是不該中止的；論情，一個讀者當預定時有的是一時的衝動，有的是聞名而不曾見面，有的在起初時對這刊物原有好感所以定下來了，過後因自己的思想進步或趣味整個轉變，那末再要他勉强看下去，實在有點無聊，也未免「殘忍」；甚有一批刊物，在最初出世的幾期裏弄得十分精彩，或者於創刊號時出特大號或附贈什麽足以使人喜歡的別冊等等，待定閱之後，刊物的內容一期比一期薄弱，如果仍舊叫人看下去，不但感不到興味，並且是無謂的浪費。但是任何出版雜誌的機關和任何大書店小書店，新書店老書店，對于這一點都不肯顧全讀者的痛苦而放鬆一步。爲了這我們就提出一個「改定退定，絕對自由」的辦法，就是說你不願意看下去時，可以另外改換一種你所願意的；還有你要離開了，或收回這筆定款作別的用處時，就可以退定，取還定銀。說得明白些，不拘什麽理由，今天定下了，明天就可以退定；

第一期看過了，第二期起就可以改定別的。這件工作，我覺得極有意義，並且切切實實盡了對讀者服務的義務，實行了四年，從經驗中改正了許多自己不甚滿意的缺點，從信譽上得到了幾十萬定戶的好感，幾千百封從讀者定戶羣裏來的鼓勵我們，稱贊我們的信，這是使我慚愧，使我感激，也使我興奮的第一件事。

代辦部工作分爲二個部門，一是屬于讀者零星委託代辦一種或幾種書報或雜誌的，獨立名稱叫郵購信託部。這部分的辦法並無特殊，祇要能切實辦到週到迅速罷了。一是屬于外埠同業委託代辦外版書報雜誌，就是與公司交易經售本版的新書雜誌之外，同時更接受它的囑託代辦別家出版的種種，絕對聽命于委託者，盡力替他設法辦到。也可以說，這樣的工作，是對於同業的服務。有人說：「這樣你們不是完全替他白幹，還得賠貼車錢嗎？」其實則否，因爲委託代辦的同業多了，當你進貨的時候，數量大了，折扣或佣有時候也能比原來規定低廉些，或另外津貼佣佣若干。這就算是你應得的報酬。雖然是微之又微，但總不至于白勞吧！

廿八　雜誌界的畸形發展

公司註冊手續辦妥之後，我們決定出幽谷而遷喬木，從小小的一間門面，搬到民國十一二年曾經出過風頭的世界書局發行所舊址——紅屋（四馬路三二四號）。純販賣是不得已而爲之的，總究不是我的志趣，且爲要實現小小的計畫，起半夜、落五更「爲他人作嫁」，也沒有什麼意義。有了幾個錢，就想自己出版比較有價值的讀物。

早晨躺在床上看當天送來的幾份日報，從申報本埠新聞後面附錄裏，讀完艾思奇柳湜先生們所主持的「讀書問答」，成爲我最近的一種習慣。

一天，在問答的末段，看到說因某種關係，要將這一欄取銷，另外改出一種週刊或旬刊的消息。自己是一個天天讀這類似函授講義的老讀者，既可惜從此不再有機會讀這講義；又想急于讀到行將改編的週刊或旬刊。爲自己，也爲別人，就寫一封信給李公樸先生。——他是申報流通圖書館主任，這一欄是歸圖書館的某一部門所担任的。

很快來了回信；很快我們就談妥了。

十一月十日，讀書生活半月刊就在上海雜誌公司裏出現了。這是第一種。

爲想減輕讀者負担，我們商定用半價辦法優待定戶。如果你在打算盤珠，任憑你怎樣打法，這半價預定是非虧本不可的。我們採取掩耳盜鈴自騙自的方法，將這本刊物假定銷數是六千份，就以六千份作爲造本預算。另外再由公司代定部附印四

千份，這四千份呢，不要編稿費，不要排工費，光是紙張和印刷，當然成本低廉多了，就將這一批便宜貨，提出來作爲半價預定，總算勉强通得過。

不料在出版的前一天後一天三天之內預定者達四千五百份。——預定雜誌踴躍到這樣，倒是生意經歷所未曾遇到過。其時，還沒搬到新房子去，小小的門市擠破了，一批要進去，一批還沒有出來，引起中央捕房派巡捕來干涉，說是妨碍了交通！

正是這一天，早晨，車夫進來報告：

「洪雪帆先生死了！」

雪帆，不失爲我一位好朋友，在某種限度下，倒比任何朋友認識我瞭解我更淸楚些。因一念之私，在死亡之前的半年間，好朋友居然變成了仇家。然而，回憶過去的友情，禁不住淌下哀悼之淚。匆匆跑去中國殯儀館送他入殮。

現代，在雪帆未死前，已經奄奄一息了，我對它，比一般店員們或他的自己人懂得更淸楚。因此有一部分的友人，對我責以大義，要我再肩起這千斤重担；可是

還有一二個有關係者竟誤認它仍是一塊肥肉，不肯放手，終至變成肺結核，漸漸地由瘦弱而至死亡。

「你是它的父親，我是它的母親，盧芳是它的奶媽。」

這句親切的話，還時時像掛在我的耳邊，對於它的死亡，眞使我感受凄愴。但是，有什麽辦法呢？這再度的分裂，是促成它由肺結核而死亡的唯一病源。

「你不能說沒有罪過。」總究成爲一句讖語。

雜誌營業的日益發旺，畫報——包括一切有價值的和雜湊投機的——佔着絕大部份。這種畸形發展眞使人寒心，雖是客觀條件造成這種不良趨勢，然雜誌公司的積極經營，不能說沒有責任；換句話說，不能推諉沒有罪過！因之，我也想從畫報來轉移讀者的視線。（畫報最大部份是銷香港與南洋羣島的），要從而提高它的水準

靈鳳主編文藝畫報，就想負起這任務。——後來因它的一再脫期，所獲的效果是等于沒有！

廿四年九月，中國文學珍本叢書開始發行了。這是出版計劃嘗試的大失敗。理想同事實，距離得很遠很遠！

規定是每週出版一種，而一種的分量少的祇有十萬字的一本，大的，差不多在六七十萬字以上。我們常常爲出版一種週刊，薄薄的小冊子，都不免要弄得脫期，那麼在印刷條件上每週一部的計畫，眞是渺茫而難有把握的。失敗，固所宜也！

尤其感到沒有辦法的，是鉛字旁邊加上斷句標點，一經校對之手，再經排字工友之手，三經打紙型時的跳動，要使它不走原樣，就是天爺爺都不敢保證的。一經移動，跳越，脫落，這點斷了的文句便會變成城樓上打鼓，不通，不通，又不通！聲明既不勝其聲明，勘誤也來不及加以勘誤，就此引起一班對於印刷情形完全不明瞭的批評家，大做其隔靴抓癢的批評，以爲斷句的人不懂原書文理，所以會弄成本來還可以讀通，給他斷了一下，反變爲不可通了。

這冤枉該向誰去訴說呢？論責任，我的鹵莽，我的缺乏自信，在今天應該向當

時有口難辯的施蟄存先生阿英先生道歉！

其實呢，偶然的疏忽和錯點，不能說完全沒有，不過無論如何不會像某先生在國聞周報上批評的幼稚可笑！文章中明明寫的是絕句，而校點的却替它弄成六字一句，八字一句，他說這就是校點的人不懂，難道連上文明明白白寫的「絕」字都會不認識嗎？絕句有六字八字一句，仔細想想，恐怕連做批評的專家也會啞然失笑吧！

因印刷技術上的過誤，會牽絲扳藤，衡量到一個校點的人的智慧上去；所以說，批評別人的不好處，眞正是一件太容易的事了。（這裏，我們該欽佩開明書店同人們有先見之明，二十五史可以用鋅版而决不排版，就爲這個顧慮。）

廿九　提高出版物的水準

已經說過，我是個文藝愛好者。在我所主持過的書店，除聯合——決定它的命運是社會科學書店外，光華，現代，總是走來走去還是走上這條文藝的路。我所認識的作家，也多是屬於文藝寫作者。

上海雜誌公司既想自己刊行雜誌，當然不會缺少文藝性的刊物。——自己的愛好，也是我自己所慣走的一條舊路。

「譯文」——唯一的世界文學作品介紹者，從與××書店分手後，要找一家出版處所。同××書局接洽過，並已與××書局簽訂下條件相當優越的合同草約。忽然有位朋友介紹給我，並介紹主編人黃源先生同我談談。

相聞不相識的朋友，對於我，都有一種誤解，認爲是很精明能幹，而又有相當架子的一位新商人。其實，恰恰相反，是一位挺馬虎，而又不會搭架子，不會侃侃而談的平凡的商人。相信我，一句話等於一份合同；不信任我，訂了合同還是要不歡而散的。越是不信任，愈會引起無謂的磨擦，漸漸地漸漸地二人中間築起一道隔膜的長城。

公樸先生的讀書生活，開始也是訂立合同的，合同滿了就沒有再訂過。如果照合同算起來，我們是吃虧得很多；但是，當我要向同他算賬的時候，他老是說——

「算了吧，你就吃虧些吧！」

聽到這句話，吃虧也就忍氣吃虧了。爲什麼呢？兩年的合作，從不曾有過一句

不好聽的話，也從沒有覆查過一回合同裏所訂的文字，在這上面嚼文嚼字；祇要他明瞭，不說我靠這刊物賺過多少多少的錢，那麽，吃虧又有什麽大不了呢？——祇要他明瞭。

爲決定「譯文」的出版處所，三家書店選擇那一家？曾開過一次談話會。還是由魯迅先生的意見，決定交給上海雜誌公司出版。理由是「沒有政治背景的純粹新書店；祇要誰不想佔誰的便宜，『精明』是無妨的。」於是在比較低的條件之下，雙方簽訂了合同。

黃先生也是一樣的懷着怕我過于精明的一個，連每期登載發行廣告都寫上合同裏去。當時，我覺得有點好笑，因爲我並不是以刊行一種雜誌，作爲敷衍某一派作家的手段。

進行合作之後，一切都使他覺得驚異，——一點不精明，和初見面時所想像的那一個人完全不同。此後合同一再滿期都沒有補訂過。

廿五年三月十五日「譯文」復刊號出現了。

接着「譯文」而來的，有她的姊妹刊「作家」。她以嫵媚的丰姿，像一位道地的北京娘兒似的出現於南方的雜誌界，也着實轟動過上海文壇，而獲得廣大的讀者羣。有「譯文」合作很順利的前例，「作家」連一紙官樣文章的合同都不會簽訂過。

這二大文藝讀物的出版，根本就不曾打算過想靠着它賺錢的算盤。（誰都曉得這不是會賺錢的生意經。）那麽爲什麽要出它呢？爲自己，也爲別人；更含有一重重大的意義，想正在畸形發展中的雜誌界，憑我們小小的努力，將出版物的水準提高起來。——出版家的精神墮落，這趨勢比純以賺錢爲目的的更可怕，更可憂慮！我以爲。

有沒有效果呢？我不淸楚。然而不久，無聊的畫報，有毒的消遣讀物從此漸形衰落，也許（可以這麽說）不無微勞吧！

尤其使我悲憤的，要算「高爾基全集」的印行。那還在這巨星沒有殞落的前三四

個月，由我同譯文社商定，並徵得魯迅先生的同意，決計以三年的時間資力，從事於全集的翻譯。全部分作六輯，每輯十部，半年出齊。為求每一位担任翻譯的人的便利，需要買齊英、德、日文三種譯本的全集。經二個月的搜集，已買到全部日文版，半部德文版，半部英文版了。這工作是艱重的，在翻譯者在出版者。正待要分別聘請專家，同時擬定一個綱要，登報公布，免得國內出版界再做重複的工作，浪費精神和資力時，另有一家××圖書雜誌公司忽在前一天刊登高爾基全集出版預告，並以一元二角的書價徵求預約。這樣，我們不能不將這艱重工作暫時擱置，等待別的全集出來。（無力競爭，也毋需競爭。）不料全書出來了，却祇有薄薄的六本。這就是高爾基全集嗎？丟盡中國出版家的臉！但是，你能說他不該用這誇大的書名麼？你能阻止他不出這樣的高爾基全集嗎？有一天，機會很巧，見到他們的經理，同在大東茶室的一個同業茶話會上，我問起他是否因我們要準備印行高爾基全集而想趕前出來呢？他很坦白的回說：——

「是的。」

「為什麼不多譯些呢？僅僅六本小冊子就算是他的全集？」

「管它呢！做生意只要這樣子好了；貴些，誰買得起呢？」他並不明白這是出版家的罪惡，更沒有清楚什麼是出版家的責任。

正還有許多同業中朋友向我面前談起這位出版家而贊許他的才幹和手腕哩！叫我怎樣說呢？誰會諒解你不是存着「同行嫉妒」的心理！

「讀書生活」半月刊從第三卷起獨立發行。我們另請平心先生主編「自修大學」兩週刊，這本刊物的出世，對於失學的靑年和在學而只知讀死書死讀書的學生，有很大的幫助，出乎意外地一出來就有了一萬五千份的銷數。（在抗戰前雜誌的銷數達萬份以上的很不多見。）可惜祇出到十四期，淞滬戰事起來，不得不暫告停頓。

三十　平地風波

廿四年冬，我因患着「準政治病」，宣告名義上的下野，另委姪兒鴻飛，担任經理。直到「八一三」抗戰發動後，才復任事實上的總經理。

「下野」廣告刊出後，有許多小型報紙不斷地對我作人身攻擊，和不曾「蓋棺」的論定；連公司的生意太好，讀者擁擠也成爲我的罪狀之一。就是甘苦同嘗的同業中人，也唯恐你不早些倒掛，好讓他在文化街上獨步。（這裏値得感謝的是姚蘇鳳先

生主編的「辛報」，曾爲檢討我的過去和現在，很公允的作過長篇論評，佔着接續三天寬廣的篇幅。）

大風起于萍末：

有幾位在東京留學的詩人們，自費刊行一種「詩歌」月刊。第一二期每期寄來五份，作爲寄售。三期起，他們要委託代理發行，私人間同店員們談起。合同並未簽訂，經理處也不曉得有這麽一回事；不料在第三期月刊版權頁上已經印上一行「國內發行所」字樣了。誰都沒有注意到它。

兩個月後，我剛從廣州創辦支店回來，主管機關委派視察員拿着查禁的命令，來公司搜查時，才發現到。但祗剩餘一本了，「依例」請來員帶回去作爲銷案。可是，這一回却例外，他說——

「你們另外再做一個呈文吧。」

這是向例不曾有過；接着又再三叮囑：——

「呈文封套外面要寫明×局×科××收轉×局長。」隨又寫了姓名說：「這就是我的姓名。」

這又是聞所未聞的奇特的手續！當然囉，我們奉命唯謹，依樣胡蘆，將經過情形，做好呈文送去。

隔了一個月，忽地奉到一件措辭極爲嚴厲的訓令，說這份「反動」刊物，既登明「國內發行所」字樣，應由公司負負；且公司方面沒有反證，足以證實這份刊物祇寄來五份。

形勢似乎嚴重了！但事實總是事實，還有聲辯的餘地。再將一切詳細經過情形補寫呈文，並說明我們的立場，將這近千種的雜誌，每天平均有二三十種出版，內容如何，書店店員是沒有審查的資格，也不夠審查的學識；更何況又是最難以懂到的「詩」刊。理由相當充分，自以爲不至再有問題了。——呈文上去之後，一個多月杳無消息。

已經是十二月，距離該刊出版日期四個多月了。突然送進來一紙高等法院的傳票。是由教育局公安局兩個主管機關聯合提起控訴的，——「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第×項。」

做夢也不會想到，這一份賣三分錢的小小刊物，竟會引起這樣嚴重的刑事！

第一庭開審了，我不會出庭。原因是我想見見主管的局長，問問明白究竟怎麼一回事。——有沒有政治的意義。否則，這來勢未免太奇特了！不湊巧，局長去首都出席全國代表會議去了，還當主席團，非等待散會不會回來。

第二庭又開審了，我還是沒有出庭。同江一平先生商量，他以爲這不是辦法，刑事案不能不出庭，下次再不到案，就要出票拘捕。

時間溜得格外快，短短的七天展期，眨眨眼就會到臨。準備去坐監呢？還是讓他緝捕？率性到別的地方去休養一下。主意打不定，一顆心也虛懸着放不安穩。然而自仗同局長有五六年同事的交情，總得當面問過清白，怎樣做都好，死心塌地。

碰巧他在開庭前一天，回到上海。第二天早晨我就去謁見。談話結果，那裏曉得他對于這樣嚴重的一件公案並沒有曉得，當然不會有意對一位老同事開這大的玩笑！要他嘗嘗比鴿兒胡同略爲舒適些的「水門汀」風味。

「那麽我的第二次呈文說得非常淸楚，爲什麽不批下來呢？」他很熱情地替我查問一下，原來還是今天剛批下去的，留在號房裏沒有送出去。拿回來看，仍是一片空話，批示裏是叫我自己向法院去聲辯。

「這不行呀！」我說：「事實總究還是事實。」

應該感謝的，他誠摯的友情！很不高興那位辦事員鹵莽的舉動，這樣小小的事情，幾乎變成一樁不可挽救的「寃獄」。于是，立刻當面改擬一份批示；但是「移文」做得斬釘截脚般結實，要說回來，倒感到不容易下筆。

第三庭又開審了，我還是沒有出庭。通緝是無可避免，江先生也覺得沒有辦法可想，很替我捏一把汗。

正是千鈞一髮的當兒，郁達夫先生特地爲這件公案從杭州趕到上海來了，就替我盡了很大而又相當困難的斡旋

——吹散漫天的烏雲，重浴溫和的陽光。——

就在第四庭開審前一天，我宣告「下野」，回歸三十年流浪生活中已經模糊了的釣游之鄉，度着長時期休息一下的淸福。

今天記起這幸而沒有成爲事實的「寃獄」的經過，我得對於那時候一切爲我盡過精力的朋友們，致最敬的謝忱！

偉大的時代到臨了！我們以十二萬分的誠意擁護——

「在抗戰期間，於不違反三民主義最高原則及法令範圍內，對于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當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

卅一　抗戰後的出版界

盧溝橋事件發生，抗戰的火炬已經點着了。華北的營業完全中止，我們預料這事變發展，上海是遲早必要聯帶發動的，于是就開始戰時的準備：其一是先將年齡較輕的練習生，先行發給川資，讓他們早些回家去。我自己在學生意時也曾碰到二次革命戰爭，母親派人來陪我回家，因爲朱老闆不答應，做了「回湯豆腐乾」。現在我以己推人，覺得抗戰一發動，他們——二十幾個練習生的家長，也一樣像我母

母親爲他兒子的安全而憂慮，所以不如事前先行遣歸，旣減輕我的責任，又可免除爲父母者的掛念。這完全是內部的事情，不料竟蒙關心我們健全問題的同業中人到處宣傳：

「上海雜誌公司七月底要關門了！」

「連練習生都遣散了！」

多謝他們的好意，有的竟跑到我的家裏來，很親切的來慰問我。我有什麼可以說呢？

「這是我們內部的事情；關門與否，事實可以代我回答。」

其二：是請編譯部主任金則人先生劉羣先生將與抗戰沒有關聯的稿件，審閱後暫行擱置；雜誌屬于八月份的都暫停發稿，以待事態的發展。同時，我們預先計劃編印一種大時代叢書，規定從九月份起，每三天出版一本。

「八一三」炮聲響了，我們發行所方面還是照常營業，不過批發部分因郵包間不

收受新書包裹，只好停止工作。

第二天——十四日——一顆炸彈落在大世界門前爆炸了，這一回震動全市，對于租界居民安全信念發生動搖，留在公司裏繼續工作本來打算不離開上海的一班店員們，也都要求回鄉下去了。你能阻止嗎？當然，不！于是當天下午拉攏了兩扇鐵門。

這回是長期抗戰，不如「一二八」；就使同「一二八」時一模一樣，關了十天半月也還得要自動開門的。因此，我們無「鄉」可歸的半上海人，仍自動起來開門營業。這時期，各種雜誌——本版的外版的都一齊停刊，根本是無書可賣，地圖和戰地攝影，變做了主要商品。

第一本出現的戰時新書，是凌青先生編著的「民族解放戰爭的戰略與戰術」。

第一種復刊雜誌，是國聞週報的戰時特刊。（八開大本的）

接着文藝刊物有譯文，中流，文叢，文學四社合編的「烽火」小冊子，由茅盾主

編。沈起予主編「光明」特刊；陶亢德主編「宇宙風」特刊。一般理論的有鄒韜奮主編「抗戰」三日刊，和編輯人協會出版「文化戰線」半月刊。挺爲一般人所需要的，倒是良友公司出版的「戰事畫報」，每期的銷數竟達五六萬份。——在「一二八」時，良友的戰事特刊，曾經獲得意外的收穫，所以這一次事變時早經準備，趕先出版，佔着銷路的上風。出版界挺愛玩的把戲是模仿，因而隨之而起來的，竟有三十多種，重複翻製，甚多連影象都看不清楚了。

當戰事初起的時候，大家都關切戰爭的勝利消息，所以多注意于晨報，午報，晚報，見一種買一種，有一張看一張；後來稍少疲倦，才對于抗戰理論的探討，防空防毒等實際知識的需要，這類書籍，也就逐漸地多了起來。我們因見到郵寄的停滯，上海的報紙不能到達內地去，報紙上刊登的名貴的各戰線的通訊和報告，沒有法子可使在大上海之外的大衆讀到，開始想做搜集的工作，將每一戰線的記事，編成一集，印成爲單行本，既可以保留得長久些，也可以推廣到遠方和內地去。這

樣，就由我自己編纂了「西線血戰」，「東戰場」，「平漢前線」，「閘北血史」等幾本集子；我認爲這是抗戰的史料，也是最有實效的宣傳文字。

抗戰初期的出版新書有兩種傾向：一種是通俗小冊子，爲要向民間普遍的推銷，高深理論固然沒有人理解；售價方面，在戰時購買力當然薄弱，也力要求低廉。——生活書店出版的黑白叢書戰時特刊，上海雜誌公司出版的大時代叢書，都是實例。一種是有時間性的或爲全國民衆注意力所集中的某一事件，如八百壯士堅守四行倉庫，新聞記事體的小冊子，和詩歌戲劇等單行本，一窩風就出了十幾種，雖是多少不免浪費，但需要的傾向很明顯的顯露出來了。此外，過去視爲神祕性的共產黨，八路軍的種種小冊子，也翻印出版有幾十種，這一批書，很少有新的著述，大都是從史諾氏的「西北印象記」一部書中分割下來的；有的從舊的「解放」裏抄剪來的。這裏很多是雙十二以前的言論與著作，到現在拿出來一翻再翻，雖有相當的銷路，總究有妨礙于統一戰線，所以中共中央亦於二月四日在漢口新華日報上刊登

通告，聲明對于這些胡亂剪輯的書籍，表示不負責任；後來中央方面也就加以查禁了。

上海，雖有着我們英勇的戰士在閘北前線抵抗暴敵的侵入，但是能夠支持到什麼時候，誰都沒有把握。上海，這個中國出版的中心，已經和內地交通完全隔絕，那麼要將各種出版物推廣到各省各市，非另有一個營業軸心不可。于是，我就決定將總公司遷到武漢去，上海公司的命運完全隨着國軍的進退爲轉移。當時除電令經理張鴻飛從廣州北上，出版部主任李菊廬從上海冒險西上，在武漢會合組設駐漢辦事處外，我自己同一部分同事，也于十月十九日離開上海繞道浙贛路，到漢口創辦上海雜誌公司的總店。

曾經說過，書店營業是靠放賬，將出版的新書雜誌委託各地販賣書店，賣出還鈔。戰事一發生，各地書店的欠賬，大都停付；有信用的，因消息隔絕，上海正在激烈戰爭中，要想付款，怕匯兌不通；次一等的以爲你既沒有法子再寄貨來，我也

落得留着作爲逃難木錢。更有心地不光明的，希望你在炮火炸彈之下燬滅了，這筆欠賬根本就不必多此一舉。這麼一來雖有五六萬的客賬放在外面，到此毫無所獲，經濟狀况雖免不感到拮据的。至於進貨方面，因在戰爭期間，今天料不到明天的事，誰都不肯再給你賒欠，一切所需如紙張印刷廣告製版裝釘都要現錢交易了。可以收取的旣無可收取了，可以賒欠的又不准你賒欠了，出版家自然要叫苦連天！爲了這，上海市書業同業公會就議決了一件重要的議案——在戰事期間，同業學校等一切交易，槪以現款爲限。——作爲補救的辦法。

因讀者的需要，戰時新書和抗戰雜誌的銷數比較平時增高很多。雖是造本都要現金，但賣出去的也是現金，一進一出，倒也周轉方便。更因印數加多，平均的成本減低，營業收入似乎也比平時可以增多些。新的出版社就應時產生，各式各樣的書，都有牠的顧主；過去完全從事販賣的書店，這時候也要自已編印幾種新書，應時點綴；求過于供，誰都可在這頭上博得一些微利。

在戰事進行中，最受到損失的倒是有工廠的大資本書店，和專以教科書爲主要業務的書店，標點通俗小說的舊書店。屬于前者像商務，中華，世界，開明，有的工廠貨棧完全犧牲于炮火之下，一時不能恢復過來；有的因範圍過大，尾大不掉，緊縮既不得，不緊縮又難以支持。(註十二)屬于後的因抗戰期間，決不會有人捧着水滸，紅樓，或韓昌黎文集，白香山詩集，閑情逸致消磨光陰的了。所以有一部份書店都祇好暫時休息一下。

驟然跑進書店裏看看，似乎新書的產量有驚人的加多，五光十色，躺滿書架子上面；其實仔細地加以統計，書的總產量比較平時並沒有加多，相反地祇有減少。這原因，乃是書的性質的大同小異，翻來翻去，編來編去，只不過是某一類性質的書籍的增多能了，並不是各部分出版物的平衡發展，平均增加。譬如關于建設方面的專門圖書，實際上這十個月來一本都不曾印出來過，學術性的著作物，也只有減少——賣完了宣告絕版了——而並沒有增多。就以雜誌一項而論，最熱鬧時代，有

過一千種以上，然而現在呢，全國的統計起來恐怕還不過二三百種而已。

在抗戰建國時代，我們需要有建設性的學術圖書，國防性的專門典籍，也能夠同平時一般源源的印出來。同時更從第一期抗戰經驗與教訓中，建起新的理論來；從參加前線抗戰工作，實生活的體驗中，產生偉大的文學作品來；爲要喚起全國民衆的抗戰情緒，發動民衆自衛武力，編製通俗的大衆讀物來！這些都是有知識的作家們的責任；也是賢明的的出版家的責任。

（註十二）中華書局的停職風潮調解了半載，到五月一日才告解決

寫在後面

在這本小小的自傳中，爲要使它寫得忠實，有些地方，變成滑稽的獨白，使人好笑；更有些地方，當讀完一遍初校様時，覺得有補充幾句的必要：

在交際場中，爲什麼我們常常覺得人與人之間不能互相融和呢？這原因，最大關鍵當然還是在個性的不同。一個人對于另一個人的批評，往往是拿了自己的「尺」去測量別人的；不能適合這「尺」度就是不好，反之，就是好人，因之，是是非非就

各有各的觀點，各有各的說法，所謂「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朋友們（包括認識的不認識的）對於我的一切，說得頭頭是道的固然也有，然而批評得體無完膚的也不是沒有。說好的，並不一定是我的知己朋友，甚多對我的了解並不清楚；說歹的，也並不一定是我的仇人怨家，除非他另有企圖。打開天窗說亮話，還是「我有我的尺」罷了！

正因爲這樣，社會上就很多有「掛羊頭賣狗肉」的；更有爲着自己的私益而對別人作無情的攻擊，和歪曲的批判。這種事情流行於文化人之間，文化事業的同行中更多得不勝枚舉。以造謠爲手段而想達到他的目的，這手段偶一用之，也許是不妨的；然而一定要將自己的脚跟下用「高蹻」墊起來，比別人高出一頭地，盡量地自我宣傳，自居領導或模範的地位，將別人的好處硬綳綳一概抹煞，似乎也大可以不必吧？我以爲。

除掉業務上，我現在簡直可以說「與人無爭」。我有我的目標，我有我的信念，

二十年生活在出版界裏，灣灣曲曲朝着這目標而前進，千辛萬苦爲實現這信念而工作。並不因環境險惡而躲避；也不受生活艱難而動搖。我明白，我所負的責任的艱重，文化工作影響於民族社會的重大和深遠！我行我素，我行我心之所安，因而，我不想用說教的方式來辯護，也不願以誇大的宣傳來代替事實。

我是幼小失學的人，因沒有機會進中學大學，所以連起碼的常識都不夠；但是三十年來竟會抓着擯筆桿兒生活的職業，隨時隨地感到才識的不夠應付，使我精神上受莫大的痛苦。我是個「有家」的流浪人，三十年來不知掉換過多少可爲而不爲的職務，失業的恐慌，家室的重負，使我物質上受莫大的痛楚　慘酷的回憶，有使我補寫這「自傳」的必要。——我想在每一個「陷穽」之前，都插上一支「行人止步」的路標，告訴給像我一樣在陌生的人生旅途上暗中摸索的朋友們，這工作也許不是全沒有意義的吧！

我是個「出版商」，二十年來生活在這圈子裏，姑不論對於文化工作做到如何成

績，對於社會影響達到怎樣程度，但是，我是個「出版商」而不是「書商」，希望認識我和不認識我的朋友們對於我有這最低限度的了解！——這是「差之毫厘謬以千里」的分界綫。雖然出版商也要爲生活爲維持事業上的必要開支而顧到「錢」，

「錢」是一切商業行爲的總目標。然而，出版商人似乎還有比錢更重要的意義在這上面。以出版爲手段而達到賺錢的目的；和以出版爲手段，而圖實現其信念與目標而獲得相當報酬者，其演出的方式相同，而其出發的動機完全兩樣。我們——一切的出版商人——都應該從這上面去體會，去領悟。一切的認識的朋友和不認識的朋友們——讀者——也應該從上頭去分析，去區別，然後方會有最低限度的認識，而不會有超越限度的譴責。出版商與書商的分界綫，不僅社會上一般人弄不明白，就連地方當局和主管的上級機關也沒有將它劃分淸楚，因而將絕對不同營業路綫和營業方式的書商與出版商，硬給你箍在一起。例如現在各省市的書業同業公會，這集團的組成，有完全以買進賣出爲主要業務的木版書商碑帖商；有各家有各家不同

版本，然而都沒有著作權的石印書商；有也有版權也沒有版權，將新的舊的圖書，給它穿上西裝的標點書商；有專將雜誌上新聞紙上所發表的文稿編纂起來，似乎有著作權而實際却沒有著作權的準出版書商；有純粹以學校用書或側重於敎科書工具書的敎科書商；有各有各的目標與信念各有各的出版路綫的新出版商。表面上，都是將白白的紙張印上一行行一堆堆的黑字而拿出來賣給讀者的賣買人，其實骨子裏根本不對勁。如果將這大串的書商與出版商放在一起，總名之曰「書業」或「書商」，（大約三百六十行中只有這樣一行名吧！）要他們牽强附會來解決它的切身問題，何異「緣木求魚」，反使同業間不能結成較好的關係，仍殘留着「同行嫉妬」的封建意識。

記得民國十七年，上海各業商會一律改組爲商民協會的時候，上海市黨部陳德徵先生指派我担任改組書業團體的負責人。當時，我提出最低限度的劃分——新書業和舊書業成爲二個團體，然後才可以進行組織，輔導成爲堅固的集團。（當然能

多劃分幾個更好。）他同意我的提議，但是格于法令，還是通不過，到現在我們書業的唯一集團仍是「只此一家」的上海市書業同業公會。

末了，還得補充一句：二十年出版生活中所見到的，經歷的，更有很多珍罕的史料，和趣聞軼事，都不能記述或詳細地寫出來，這未免可惜，也與寫這本書的初意有些不符合。然而，事實上，人情上都不許你暢所欲言，祇得留待將來有機會時再行添補進去，或者有更大的自由時另寫一本——出版界掌故吧。當上海「立報」創刊時，我也曾有這樣的企圖，曾經刊登過十幾則，後來友鸞兄離去就停筆了；包天笑兄接編花果山時雖曾希望我能繼續寫下去，但總究為怕引起不必有的誤會，掀起無謂的麻煩，雖是玩笑式的也還是不寫的好，我覺得。不料現在仍舊同從前一樣感覺「還是不寫的好」，眞是不勝遺憾之至！

一九三八・五・二十・跋于漢口且休止齋

附錄：雜誌發行經驗談

「怎樣可以使雜誌的銷路廣大起來？」——

常常有朋友提出這樣的問題，來請教我從事雜誌事業的「專家」，這一問，就窘倒我了！因爲「怎樣」的方法很多，有時也很簡單。說得長些，寫一本書也說不完備；說得短些，歸根結底祇有一句話——

「內容充實！」

講到內容充實，或怎樣使它充實起來，這是編輯先生的事，發行人是在船裏着力，無濟於事。不過一定要從發行方面談談有什麼新的技術呢，那倒也並不是絕對沒有。然而這不是技術，算是我多吃幾年「雜誌飯」，所獲得的一些「或許有用」的經驗心得。

就將這一點點的心得，寫出來，作爲這一問題的答案吧！

「怎樣可以使雜誌的銷路廣大起來呢？」要分作兩方面來談它：

一類是屬於私人出版的或沒有多少基金的雜誌，出版者希望能於短時間裏達到相當發行額，然後可以使這本刊物長命下去。在公司業務上，這類刊物，多是屬於代理發行的。

在幾百幾千種雜誌中，要使你的刊物從那裏竄出來，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一，要使各地的讀者都曉得有這樣一本東西（買與不買是另一問題），第二，要使它能達到每一家販賣書店（賣得掉與賣不掉是另一問題），第三，要使讀者怎樣會

拿出錢來買你的雜誌（滿意與不滿意是另一問題）。

解決第一個難題，當然需要宣傳。在沒有出版之前，先發布一種預告，在預告中說明將有怎樣性質的一種雜誌出來，它的內容有怎樣的特點，是適合於某一階層人讀的。這裏最要緊的是祇限說明特點，切勿誇大；尤其不必說上大堆空話，減少讀者注意力，或寫上大批特約撰述者的大名，給讀者一個過高的期望。這預告在同類刊物上刊布可以，自己印成一種小傳單也可以；據我的經驗，最好還是登在有價值而沒有色彩的日報上，比較有效力。

預告中不必說明創刊的日期。待到出版的前一天（這時書已印出來了，但是絕對不必急於拿出來發賣），將這一期的內容，性質，特點先刊登一天廣告；廣告裏在顯明地位印出「明天出版」字樣和「經售處」的詳細地址店名。當晚或第二天早晨將各書普遍的送到各經售處所，然後再來個第二次的廣告。那個廣告的樣式是完全與上一天不同。廣告的大小，地位的適當否都需要事先辦妥。這麽一來，一定會

使每一個雜誌的讀者都注意到它，我相信。

第二個難題，是提早發天出書或延緩發天刊登廣告。最使販賣書店感到不愉快和使代理發行者頭痛的事，是當天出版的雜誌，當天刊出廣告。因裝訂的不能如意迅速，難免中斷或趕不齊全。既見了告廣如果不寄發，則販賣者一定不高興，如要統統寄發又沒有這麼齊全可以自由分配。（日報比郵包寄遞迅速，倘讀者見報後跑去詢問，回說沒有到，三次兩次之後，已使一位熱忱的讀者感到不舒服，第一件印象已經不好了。）不得已時，祇好可寄的寄了，不可寄的就此擱下；或者甲地本可預算寄發五百本，乙地三百本；因缺乏關係不夠分配，祇得甲乙地平均減少了。雜誌有時間性的，且販賣書店因營業競爭，到達先後十分注意，如果第一批寄去二百本，第二次待書裝齊了再補寄三百本去，那麼這後補的三百本，一定有大半銷不出去的。這一點在發行上關係非常重大，然而在出版人方面却大多不肯顧到。甚多有報上已刊出廣告了而雜誌還在印刷機上還沒有落版。爲一本刊物之「長命百歲」，

其實早一天兩天見到廣告有什麼關係呢？心急的朋友，你更沒有方法說服他！

第三個問題，百分之百是編輯人的事，發行人是沒有方法用力的。倘使說有，也不過多貼幾條廣告紙在書店裏外，或將新出的刊物放在使讀者最注意的書櫃上吧了！屬於編輯工作的；那麼第一期能夠出一種專號或特輯當然好些，然而這專號特輯是要有內容的，並不光是篇幅的加厚，原來賣二毛一本的，這一本定要賣四毛五毛；倘使沒有中心而光是篇幅的加厚，還是老老實實的不弄花巧爲妙，我以爲。其他如封面的莊重或輕巧，排式的嚴肅或活潑，那是隨雜誌的內容和讀者對象而定，誰都明白的。

創刊號雜誌的銷數，一定會比平時的或是後二三期的爲多，所以第一期雜誌編得比較有精彩或發行得普遍，與未來的銷數有極大的關係。譬如創刊號有五千份銷數，等于說這本雜誌有五千個讀者了，但是這五千個不是確定的，以雜誌的內容和興趣，五千個中間，也許有一二千個在讀過第一期後感到不滿意而不再買下來了，

所以第一期五千個，第二期時就減少爲四千個了。當然也有因讀了第一期後特別感到滿意，處處爲刊物作口頭宣傳或實際介紹，反使沒有買過第一期的人，也變成讀者了。然而這是取決於內容的，從發行上講，只有低落而不會增加的。

怎樣可以拉牢已讀過第一期的讀者呢？上面已經說過，最重要的是不使讀者過於失望。爲了這，所以未出版之前千萬不要自己過於誇耀，或者不必要的寫上一大批特約撰述的名單。在預告時候，讀者因爲過於誇耀幻成一種理想的讀物，以爲一定是百分之百的配他脾胃的；待到讀完之後，覺得距離他的理想很遠很遠，於是起了反應感覺失望，（其實雖並不一定像預告時的圓滿，却也並不一定壞的。）不但自己從此跳出讀者圈外，還要逢到朋友時處處作主觀的批評，這是頂可怕，也是辦雜誌的朋友和出版社應該避免的地方。

反之主辦雜誌的祇要抱定宗旨，堅定信念，埋頭實幹于自己理想雜誌的創造，脚踏實地，一步一步的漸進，不誇大，不作過份的宣傳，則讀者方面對這本雜誌決

不會發生反感，讀了第一期時他倒會覺得內容處處（或大部分）適合自己的興味，因而發生好感了。

事實上，也有許多很好的雜誌而銷路並不見得廣大者，如果不會犯着上述的病徵，則創刊號出版時發行的不普遍，當然也是主因之一。在抗戰期間因郵遞不便，常常有可以銷售的區域沒有代售處所，到三五期後，交通恢復，才從中間寄去，已經引不起讀者的興趣了。因有很多很多的讀者，歡每一種雜誌從頭買起，待買不到第一二三期的就連新出的也率性不買它了。也正因爲有這樣的買書脾氣之故，所以無論何種雜誌內的長篇連載切不可多到二三種以上。通常的理想，以爲有名貴的長篇連載一定可以拉牢讀者的了，其實則否。我已經說過，第一期雜誌的讀者並不個個是第二三期一定會繼續買下去的讀者，那麼你卽使有名貴的連載，喜歡的固然被你拉牢了，那不喜歡的，還是不重視它。這樣譬如剩下來八折的讀者，因人事的變遷，事實上不能繼續下去，一期復一期，讀者也就一期少一期了。到第三四期時，

別的雜誌還有新生出來的讀者可以彌補，或者反會增加；惟有靠長篇連載：雜誌，就不會有中途插進來的讀者的。正因爲你有連載，他就非補全第一二期不可，倘然補不齊全，或內地書店裏買不到它的時候就絕對不會再做你的讀者了。這樣——靠三五種長篇連載——的雜誌，它的銷數，一定一期少似一期，到整個失敗爲止，沒有方法逃避它的惡運的。

另一方面，還有一類雜誌的銷數是漸進的，愈出得久銷數愈高，多出一期增多一批讀者。這一類刊物，從公司業務上講，是屬於自己出版自己發行的，或有相當的出版基礎或較多的基金。

這一類雜誌的發行，自有它的發行路線，因基礎的鞏固或資金的周轉靈活，可以脚踏實地的緩緩進行，不怕短時間的虧蝕而弄成夭折。但是在發行上能夠辦到普遍達到，使每一區域的每一個讀者都有機會不間斷的讀到它，當然是重要的工作。就使第一期第二期都引不起讀者的注意力，因而銷數並不廣大是不足焦慮的。這一

類雜誌的銷數，老實說是要編輯先生的努力，所說——內容一期比一期充實，才有辦法，才有希望，心急是無濟於事而反足以動搖自己信念的。

無論誰，要想辦一種雜誌，決不是爲給自己玩兒的，而自有它的目標和讀者對象的。這樣，祗要你朝向你的目標邁進，對着你的讀者對象而努力，出版愈久，讀者對于你的了解愈深切，出版期數愈多，銷路愈廣遠，而銷數也愈益增高了！因爲從最初少數的基本讀者方面，自然而然的替你口頭的宣傳和事實上的介紹，一變二，二變四的地逐漸地加增高起來了。

爲什麽第一類與第二類的情形完全不同呢？其實也並不是絕對的不相同，本來主辦一種雜誌，要它的銷數廣大起來，並不是也並不必「速戰速決」的，祗要你用你的全副精力放在充實內容的工作上面去，讀者決不是盲目的，決不會使你的精力白化！

不過，辦雜誌也決不可以太空想了。現實的環境和社會的需要也得面面顧到。

第一件事要避免的不可跟在別人的背後，踏着別人已經走過（無論是成功還是失敗了）的脚痕。必需要看清楚環境，估準足需要，再別創一格的創辦你理想的讀物。換一句話說，「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不同的巧妙，就是成功的鎖鑰。

有許多出雜誌的朋友，常常硬要委託我們替他做「發行機關」（代理發行一宗業務，公司方面現已停止了），他以爲一定可以比較別的書店可以多推銷些，這心理其實是錯誤的，也正因爲這樣，我們更不敢接受代理發行的雜誌。打開天窗說亮話，無論那一家書店替你代理發行，都是同樣可以普遍的，除非他有意替你放在書架子上不發出去。雜誌銷路的對象是讀者而不是書店（代發行書店和各地販賣書店）如果這雜誌是讀者需要的，那麽任憑你放在那裏都有人來買，反之，即使堆滿在各書店裏也無人顧問的。

所以一種雜誌之多銷與少銷，在發行上的努力，效果眞是微弱得很，不值得重視的！

爲什麼我們對於代理發行雜誌的業務，會不積極經營呢？這當然也是我們營業計劃上的失敗點，現在順便也可以談談：

第一是貨款方面：雖曾對于外埠販買同行這樣說過——雜誌交易是要現錢的，但是，書店營業上主要方法是「放賬」，已經成爲一種牢不可破的習慣了。雜誌的代理發行和販賣，因寄費的加快和加重，糟蹋和破損，常會使代售者只有損失，使販賣書店感到不合算，還是不代售吧。倘使爲營業上着想或交情上關係，非代售不可的話，也不肯爽爽快快的拿出現錢來批購。這樣一來，雜誌是有時間性關係不許你耽擱的，卽使沒有錢來，也不得不放賬了，放賬又成爲習慣，現錢交易等于批發章程上的具文了。但在代理發行與出版人方面訂有合同，不管你現賣也好，放賬也好，到了合同規定收款的日期，爲實踐信諾，不得不墊付。結果就變了一面現錢買進，一面賒賬放出，代理發行者吃力而不討好。

第二是存書問題：發行網綫遍布全國，因交通的不便，郵程滯遲，從上海到達

川黔滇甘桂等處往往很需要多的日期。富于時間性的雜誌，到可以發賣的時候，它的時間性已經失掉了。現買的不能退，販買者吃了虧，下一期不賣了或格外減少；放賬的，反正是賣出會鈔，賣不出去的就讓它捆擱起來，到他高興或想起來的時候一起退給你。在代理發行與出版人間也有合同訂明的，有的是二三個月收清書款，到了規定日期，沒有退書當然要錢，不能異議；有的是可以退還的，但私人出版雜誌，不能長期不告結束，或是停刊了，或是另掉一處發行處所了，或是掉一位編輯換一個刊名了，總之，你的書還沒有退回來，應付的書款早經墊出去，待到你把賣不掉的存書退回來時，這一本雜誌早已成爲歷史上的東西了。這一筆損失當然又歸代理發行人負担。

第三是銷數問題：無論誰，對于自己親手編印出版的雜誌，總希望它能大量的銷去，有廣大的讀者羣。他之所以要交給你代理發行，唯一的希望是銷數能比別處擴大，達到他理想的數額。至至內容如何，發行人不能批評的，各人都愛惜各人的

毛病，自己如果看起來也覺得不好，也不會拿出來印行的。因而，如果這一本雜誌的銷路不好，他決不會怪自己刊物的內容欠充實，或社會不需要它；頭一樁想到的怪你替它推銷不努力（意思是說如果你特別努力些，銷數決不至這麼少）！當然，不努力也是致命傷的一因，但是你如果提出來，這雜誌的未出版之前應該這樣做，已出版了應該那樣做，或是印刷方面應該精美（最低限度也要不惡劣模糊），定價方面不可這樣高，廣告一定要登在有廣大銷路或與這刊物的性質有相互關聯的，多登發行或多登發家。這種種十個有八九個是不會依你主張的，甚多偏偏會同你所希冀的辦法相反。這樣銷數的不會廣大起來，論理是代理發行人不負責任了，可是出版人不會原諒你的，因而很好的一起朋友為了這小小的不諒解，弄得不歡而散了。

「怎樣可以使雜誌的銷數廣大起來呢？」

除掉上面所說的可以寫述出來的原因之外，還有很多，很多像一部廿四史，無從說起的。總之一句話——

「內容充實！」——不必怪那些代理發行的書店和你的朋友——任何雜誌都是賣給讀者的，而不給書店的。」了解這，一切都可以心平氣和了！

寫這篇文字的動機，還是柳湜先生在香港「生活日報星期增刊」裏做過一篇「雜誌編輯經驗談」。他在引文中涉及到我，說關于發行方面希望我來做一篇「雜誌發行經驗談」。當時我曾經答應下來，可是還沒有動筆，「生活日報」停刊了。到現在才寫好，已經二年了，算踐了朋友的預約，就將它放在本書的後面，作為附錄。